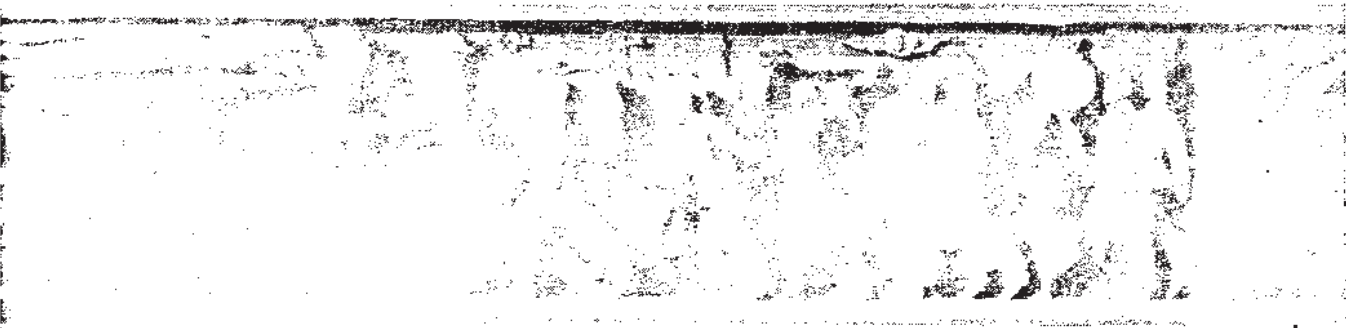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一九五九年

12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五九年第十二期 ★

目 录



- 领导农业生产中的几个问题 曾希圣(1)
- 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生产的关系 龔育之(9)
- 指标要切实合实际 許辛学(18)
- 关于写文章 施东向(21)
- 治水工作的辩证观点 李凡夫(23)
- 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 邓 拓(30)
- 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问题 胡 鈞(38)



领导农业生产中的几个问题

——安徽省农业生产的经验

會 希 圣

农业生产是党领导广大农民与自然界作战，向自然界索取财富的斗争。这个斗争极为复杂，而且强烈地受着自然界的影响。在农业生产中，要遇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土质，不同的作物，不同的气候。农业生产几乎与所有科学部门都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直接参加农业生产战线的人，在我国，包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而且战线极为分散。从农业生产受自然界的影响来说，一般农作物都怕旱怕涝，怕风怕雹，怕霜怕冻，怕虫怕病。而从我们本身的条件来看，技术还很落后，既少化肥、农药，更少农业机械。另外，为了团结全体农民积极向自然界作斗争，还要不断调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过程和其他共同活动中的关系。所以，要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财富，使农业生产取得高速度的增长，是一个非常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提出“鼓足干

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同时，对农业生产提出了明确的方针和措施，使我们在农业生产中有了明确的斗争方向。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基本原则，抓紧抓好农业生产中的关键性问题，以保证农业生产继续不断的大跃进。

从安徽的情况来看，凡是能够正确地全面地贯彻这些基本原则，抓紧和抓好农业生产中的关键性问题，农业生产的生长就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几十。不仅在正常年成能够增产，而且在一般的有灾年成也能增产。根据安徽几年来的实践，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经验，我们认为要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业大跃进，必须抓紧抓好以下四个问题。这就是：战胜自然灾害，挖掘自然潜力，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和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战胜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是农业生产的大敌。在作物生长期間，一旦遇到灾害，如果不能有效抗御，那就会造成减产，甚至失收。安徽是一个多灾地区，对此我們体会更深。一九五二年及一九五六年的涝灾，都是在十天左右，一九五二年淹毁庄稼一千五百多万亩，一九五六年淹毁三千六百多万亩。一九五〇年及一九五四年的洪水，都是在七天左右，一九五〇年淹没庄稼三千多万亩，一九五四年淹没五千多万亩。一九五八年的旱灾，六、七、八三个多月不雨，受旱面积达六千多万亩。一九五三年的霜冻，在一个早上，冻坏麦子三千多万亩。一九五六年的风灾，高秆作物全部刮倒，中稻落粒严重。其馮虫灾、病灾、雹灾每年都給我們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損害。事实很明显，如果不克服可能克服的灾害，防止可能防止的灾害，农业增产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领导农业生产中，特别是象安徽这种多灾地区，首先要抓紧的問題，就是战胜自然灾害。

只有战胜灾害，才能保卫劳动果实，这是容易理解的道理。但怎样才能抓紧和抓好这一工作呢？根据几年来的实践，我們深深感到，与自然灾害作战是一场十分浩大、十分艰苦的斗争。首先，应该在全党全民中树立起不屈不挠的斗志，不如此就不能长期坚持战斗。其次，要研究出簡便易

行、人人能作的办法，不如此就不能达到花力少、收效快的要求，就不能在灾害侵犯的情况下不断提高农业生产，也就不能提高群众的斗争信心。我們是采取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个要求的呢？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以治水为綱。安徽水灾最为严重，不消灭水灾，农业生产就不能得到保障。随着水灾的消灭，就可克服旱灾，克服了旱灾，即可減輕伴随旱灾而来的虫害和病害，又能根据气象预报，进行霜前灌溉，防止或減輕霜灾。这两年的霜冻沒有引起较大危害，就是由于进行了霜前灌溉，增加了地面温度的結果。水害是各种灾害当中的主要灾害，消灭了主要灾害就可結合防止許多次要灾害，所以应以治水为綱。当然，治水斗争也应实行簡便易行、花力少、收效快的原則。我們在治水方针上采取以群众自办为主，以小型为主，以蓄为主的道理，就在于此。

第二，是防治結合，以防为主。防患于未然，不仅能节省扑灭灾害的劳力和費用，而且更利于作物的生长。对于目前还不能控制的灾害，如油菜毒素病以及其他一些自然灾害(台风、冰雹、霜冻等)，固然要大力作好預防工作，就是对那些可以消灭的病虫害，如豌豆象、綫虫病等，也应在全力将其歼灭之后，防止其死灰复燃。当然，預防还是相对的，所以必須防和治相結合。但治也要事前做好准备，才能治得及时，治得有效。今年的麦锈病



沒有蔓延，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事前做了防治的准备。

第三，是利用作物特性，抵抗灾害。作物的特性，有的耐旱，有的耐涝，有的抗病，有的抗虫。作物的这些特性，应该很好利用。几年来我们在这一方面已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在湖洼地区，改种了水稻和其他耐水作物；在丘陵易旱地区，把水稻改成旱粮；为了抵抗小麦吸浆虫和锈病，普遍推广了“南大2419”品种；为了抵抗油菜毒素病，正在推广“胜利”油菜。所有这些，都是利用作物特性来抗御自然灾害的有效措施。

第四，是利用作物生长季节，避开灾害。安徽很大一部分地区，在七、八、九月份往往非旱即涝，对农业生产威胁很大。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办法是增加夏收作物和多种早稻。因为这样做就可避开不利季节，争取在气候比较平稳的季节里多收粮食。这个办法也同样适用于对付病虫害，因为一般农作物的病虫害都有它一定的流行季节，把作物的生长期同它的危害期先后错开，就可以减轻受害程度，甚至完全避免灾害。

第五，是用改善耕作方法来防御灾害。如深耕以保墒防旱，作畦田、台田以防涝防旱，挖排水沟以防渍防病，“烧包子”（是安徽农民习用的一种熏肥方法）积肥以除虫等等，都可以抵抗和减轻自然灾害。

从安徽的情况来看，自然灾害虽然严

重，但战胜自然灾害的办法是很多的。只要把这一工作抓紧抓好，在一般有灾年份仍能增产，这一论断已为许多有灾年份的增产事实所证明，更为一九五八年在干旱情况下仍能大跃进的事实所证明。

挖掘自然潜力

要高速地发展农业生产，不仅要战胜自然灾害，而且要充分挖掘自然潜力。战胜自然灾害主要是保收问题，挖掘自然潜力，是进一步提高产量问题。只保收而不能进一步提高产量，农业增长速度，仍然是缓慢的。所以，挖掘自然潜力，是领导农业生产必须抓紧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农业生产的自然潜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天力，如日光、温度、空气；二是地力，如土壤、水分；三是物力，如肥料、种子等。要把这些潜力挖出来，就是要想尽办法，把它们效能尽可能地加以利用，不白白地浪费掉。古语说，“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就是这个意思。怎样才能把它们利用起来呢？我们认为必须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多种。办法是提高复种指数，扩大播种面积。因为这样做，就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也就可以充分发挥日光、温度、土壤、水分的效能，达到增产的目的。有人认为，提高复种指数会“剥削”地力，这种想法是不全面的。虽然，由于提高复种指数，会多吸取土壤里的一些养分；



但如果实行秸秆还田和增种绿肥，那就不是“剥削”地力，而是增加地力了。有人认为，提高复种指数和扩大播种面积是一种过渡的办法，在达到高产以后就不宜这样做了。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还值得考虑。因为提高复种指数是提高亩产的有效办法，只有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量之后，才能更好地实现“三三制”的耕作制度。在高产以后扩大播种面积，仍然需要，或许那时可以考虑少种粮食而多种其他作物罢了。当然，提高复种指数是有困难的，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可想。例如，利用作物的成熟早迟，安排好“茬口”，就可错开播种时间，解决劳力的紧张；利用快速育秧争取早播早收，就可腾出土地增种晚秋作物；利用育苗移栽，就可错开土地的使用，争取季节。麦茬棉过去收成不高，人们不愿种，自从改成营养钵育苗移栽以后，收成与春播相等，麦茬棉的种植面积就大大增加了。所以只要想办法，土地的利用率是可以逐步提高的。今后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我们还应该使它进一步提高。

第二，实行合理密植。密植的作用就在于增加单位面积内的作物总株数，以充分利用土地和日光的效能。但密植必须合理，“不可太稀，不可太密”，应该“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我们认为，密植

程度的主要标准就是在作物成熟以前，还能通风透光，否则就不是发挥自然潜力，而是妨碍对自然潜力的利用了。间种或混种，是密植的另一种方法。禾本科作物和豆科作物间种或混种，禾本科作物可以利用豆科作物的根瘤菌所制造的氮肥。矮秆作物和高秆作物间种和混种，矮秆作物可以吸取从高秆作物中间透过来的阳光。这种办法只要搭配得当，都能发掘自然潜力，都能显著地提高作物的亩产量，而且这种办法在群众中早有习惯，只要抓紧抓好，是容易推广的。

第三，改种高产作物，选用优良品种。高产作物和优良品种的根系对养分的吸收能力强，茎叶对日光能的利用率高，所以能更有效地利用自然条件，达到增产的效果。如淮北改种水稻，就可比黄豆、高粱增产到几倍。在同样栽培条件下，优良品种比普通品种一般可以增产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高产作物的优良品种，增产潜力更大。同一作物的优良品种，特性常不相同，有的早熟，有的迟熟，有的耐肥，有的耐瘠。只要我们把品种的性能搞清楚，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就可以挖掘不同环境的生产潜力。

第四，发挥水、肥效力。水分是作物的“血液”，肥料是作物的“粮食”。要发挥水、肥的效力，关键在于开源节流、合理使用。安徽由于塘堰、水库、河网的兴建已蓄水不少，目前极需改进的是灌溉方法。如水稻的浅水勤灌和湿润灌溉，旱作的沟



灌、畦灌等等，不仅能节省用水，而且又适合作物的需要。几年来群众所创造的积肥十字诀（熏、烧、挖、换、扫、筛、漚、堆、拾、捞），已初步解决了农业大跃进对肥料的需要，但目前肥料还是不够的，今后要特别抓紧的是进一步用种、养、制三个办法来挖掘肥源。种，就是多种绿肥。养，就是多养家畜家禽，多积粪肥，并养水生动物（如螺蛳、蛤蚌、草虾子）作肥料。制，就是制造化学肥料和细菌肥料，以增加肥料数量和提高质量。在目前肥料不足的情况下，不仅要抓紧制肥积肥工作，同时还要强调合理用肥，如秧根沾肥、带肥下种、看苗追肥、“烧包子”、叶面喷肥等办法，都可以使少量肥料发挥最大肥效。这些节约肥料的办法，应该大力推广。对那种把过多的肥料集中使用到一块田里的浪费作法，应该加以改变。

第五，精耕细作。精耕细作，是全面贯彻“八字宪法”所必须采取的一个根本办法，它的作用是使各种自然潜力的发挥和利用互相协调，以适应作物的生长。这需要有一系列的栽培技术，必须认真抓紧。经验证明，耕作愈细致，管理愈得法，就愈能发挥自然潜力，愈能提高作物的产量。所谓“多加一分工，多收一成粮”的道理也就在这里。

自然潜力是无穷的，指导农业生产的任务，就在于把挖掘潜力的办法不断发展和提高。

認真解决劳动力不足問題

不論是战胜自然灾害，或者是挖掘自然潜力，以及其他各种生产事业，都必须通过人的劳动，才能实现。

目前的情况是：农业生产技术条件还比較落后，几乎全部是手工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就必然发生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因此必須認真地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就会使生产跃进计划受到影响。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根据目前情况，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做：

第一，要合理分配劳动力。对劳动力的使用，如果听其自流，或分配不当，都会产生此多彼少，余缺不均，一边浪费，一边过分紧张的现象，所以必须进行合理分配。合理分配的原则是统筹兼顾，保证重点。但兼顾一般与保证重点是有矛盾的，往往保证了重点，就忽视了一般，兼顾了一般，又影响了重点。同时，重点与重点也有矛盾，保证了这个重点，又可能影响那个重点。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我们提出了首先解决各种生产计划之间的相互矛盾（如农业与工业，农业与林、副、渔、牧业，与服务业，与水利建设等等），再按计划制定各种劳动定额，进行分配。事实证明：凡是这样作了的，结果都比较良好，既可避免因互相牵扯造成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又可使工、农、林、副、渔、牧互相竞赛，大大提高劳动效率。



第二，要合理布局。布局合理，就能大大节省不必要的劳动支付。例如：调整了插花地，就能够减少往返，增加劳动时间；合理安排社办工业、副业和经济作物的生产场所，就可以便利产品、原料的调运；合理设置收购点、供应点和仓库，就可以缩短调运距离，消灭重复运输和便于群众购买；合理安排作物“花口”，就能错开农活时间，避免忙闲不均；合理安排农活，把能提前做的农活尽量提前，能推后的农活尽量推后，就可以集中主要兵力，用于主攻战线；合理积肥、蓄肥和用肥（就地积肥，远地多上细肥，近地多上粗肥），合理安排木材生产（冬春砍伐，夏秋运输），都可节省大量运输力量。总之，在农业生产上只要精打细算，做到合理布局，对节省劳动力的效果是很大的。

第三，要合理组织劳动力。这就是说，要把一切能够劳动的人组织起来，在生产中实行合理分工和合理协作。劳动力组织得好，四个人可以起五、六个人的作用；组织得不好，四个人起不到三个人的作用。合理组织劳动力的任务，首先在于解决劳动力与农活的关系。对劳动力强的人要分配重活，劳动力弱的人应分配轻活；对经常性和技术性较高的农活，要固定专人负责。对季节性较强的农活，除组织临时队伍进行突击外，还要尽可能组织附近农活不忙的劳动力进行协作，以闲济忙，或者组织非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进行支援。对大面积的农活要集体干活，对零星的农活，

应包工到户。其次是解决劳动力与工具，劳动力与场所，工序与工序之间的互相关系。使工序与人数相称，不发生缺此缺彼的现象，使场所与操作相适应，不发生拥挤现象，使工序与工序相衔接，不发生等待现象。只要把这些解决得妥当，劳动力就能大大节约，劳动效率就能大大提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特别是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应把它当成生产中的一门科学，经常进行研究和讨论。

第四，要逐步进行工具改革。在目前这是提高劳动效率的中心环节。每一项成功的工具改革，都能提高工效一倍到几倍。如滑车运土器比人工挑抬效率提高六倍，封闭式水车比旧式水车效率提高两倍。事实证明，改革工具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大、最有效、而且又能降低劳动强度的好办法，必须认真抓好这一工作。首先要抓重点，也就是抓住那些生产上迫切需要、制造容易、能够节约大量劳动力的工具，加以改革，如播种、收割、提水、运输、加工等工具。在工具改革中必须抓重点。根据我们的经验，要把工具改好，必须使机器厂的技术人员和农村中的铁木匠相结合，前者有制造现代工具的技术，后者有长期制造农具的经验，彼此共同研究，容易做出较好的工具。在推广改良工具之前，要反复进行现场试验，证明确实可用，才能推广，否则必然造成浪费。在推广新式工具中，还必须加强技术传授，使群众会用会修。只有这样，才能使



新式工具迅速推开，才能发挥新式工具的作用。

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根本办法，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肥料化学化。对此我们必须根据需求和可能，逐步实行；但要完全实现，这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我们不能坐着等待。在目前，劳动力虽然很紧张，但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切实抓紧，从多方面提高劳动效率，劳动力不足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要战胜自然灾害，挖掘自然潜力，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这一切都离不开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群众没有积极性，就不会有干劲，就不可能在农业生产战线上打胜仗。所以，提高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领导农业生产必须抓紧抓好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现在农村已经实现了公社化，人民公社这种先进的制度，为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这种优越性仍要靠人去发挥。同时，人民内部存在着的矛盾，仍然需要我们正确地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决。因此，要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还决定于我们工作做的好坏。

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既不能靠空洞的口号，更不能靠强迫命令的方法。最主要的应当是，依靠不断地提高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依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因为只有如此，才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只有这种局面，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将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大大地提高生产积极性。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认为必须抓紧抓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不断地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加强政治工作。只有加强政治教育，才能提高广大干部和社员的思想觉悟。只有觉悟提高，才能使群众懂得集体事业的发展才是共同富裕的道路，从而自觉地维护集体利益，为集体事业的发展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只有觉悟提高，才能使群众明确奋斗方向，看清幸福的将来，为更远的理想而奋勇前进。只有觉悟提高，才能使群众认识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充分地发挥积极性，团结一致为共同目标英勇奋斗。

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做好政治工作，同时，也要对个人给以物质利益的关怀。只有物质利益的关怀，而不做政治工作；或者只做政治工作，而没有物质利益的关怀，这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第二，正确地全面地贯彻党的政策。党的政策都是从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大量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的，只有正确地全面地贯彻党的政策，才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如果在执行政策时发生



偏差，不仅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而且会损害群众的积极性。比如，包产指标偏高，以致无产可超，或者过分偏低，鼓不起干劲；积累与分配的比例，不分穷队富队，一律照规定生搬硬套，使穷队社员减少收入；实行密植，认为越密越好，以致作物生长不良；过早地实行“三三制”，减少土地利用，把明天的事情拿到今天来办，以致减少产量；抓生产就不抓生活；谈鼓足干劲就不注意休息；谈破除迷信就不尊重科学。所有这些偏差，都会影响群众的积极性。

要做到正确地全面地贯彻党的政策，防止偏差，一方面要认真学习党的政策，真正做到学全学透；一方面要深入实际，摸清情况，老老实实在地反映情况。但也不能说由此就不会发生偏差了，一些小的偏差总是难免的，领导的责任在于及时发现它，及时纠正它。领导的艺术在于既能严肃地纠正偏差，又能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第三，要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这是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的根本关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人民公社的生命”。群众路线问题对干部来说，不单是一个根本的工作方法问题，而首先是对待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应该认识到，在一切工作中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权力，在一切场合都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只有从这一根本态

度出发，才能做到遇事和群众商量，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认真地种好试验田，通过参加生产，来领导生产。运用任何一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都必须以正确的群众观点为前提，如果没有正确的群众观点，就不能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就不能收到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效果。

提高群众的积极性的问题，也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问题。一切工作，一切措施，都应当以提高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准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

总的说来，要抓紧抓好农业生产，关键在于学习，在于调查研究，在于掌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正象过去的革命战争一样，我们所以能够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战胜了强大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力量，正是由于我们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掌握了战争规律。现在与自然作战，尽管我们的技术条件还比较落后，但是只要掌握了它的规律，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就一定能够继续跃进，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



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生产的关系

龔育之

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自然科学工作占有重要的地位。为生产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是我国自然科学工作的根本方針。根据馬克思主义的原理，闡明自然科学同生产的相互关系，闡明自然科学的发展依赖于生产实践，又反过来指导生产实践，就能帮助我们正确地、全面地理解上述的根本方針。我們必須反对脱离生产实际、为科学而科学的傾向；同时，要注意在以首要的力量从事于解决直接为生产服务的科学技术課題的时候，对理論的研究工作和滿足长远生产需要的研究工作，給以足够的重視。

自然科学的发展 对生产的依賴关系

自然科学是人对于自然規律的知識，人依靠这种知識，按照自己的目的来进行改造自然界的活動。毛澤东同志說，“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赖于物質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与自然的关系”^①。他又說，自然科学是生产斗争知識的結晶。因此，对

生产的依賴关系，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根本的規律性。

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于生产的依賴关系，我們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生产实践是自然科学知識的源泉，是檢驗自然科学知識的标准。生产的发展給自然科学提供日益丰富的研究材料，开辟日益广闊的研究領域。

实践是一切知識的来源。人对于自然規律的知識，来源于人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来源于生产斗争的实践。在古代，当生产实践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經驗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在这个基础上便获得了初步的自然科学知識。古代的自然科学，差不多是完全以直接的生产实践的經驗，以及对自然界的直接观察为基础发展起来，并且在生产实践中进行檢驗的。近代資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了生产的巨大发展。在近代生产实践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兴起了近代自然科学。在近代自然科学中，逐渐发展并大量运用了实验方法，扩大了自然科学

^①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1頁。



的实践基础。但是,直接的生产实践,仍然是自然科学知識的重要源泉、檢驗自然科学知識的重要标准。广大的劳动群众在长期的实践中,創造着和改进着生产技术方法,对自然界和生产过程进行着細致、深入和广泛的观察与了解,不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生产經驗。总结这些經驗,对于发展整个自然科学,現在仍然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生产实践是人的認識活动中的一个极为活跃的因素。它經常是突破自然科学中的陈腐观念,推动自然科学前进的根本动力。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生产者获得了經濟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彻底解放以后,表现得最为明显。斯大林根据苏联在这方面的經驗,曾經反复强调:“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認偶像,不怕推翻过旧物,却很仔細倾听实践經驗的呼声。”^①“有时候,开拓科学和技术新道路的,竟不是在科学界著名的人物,而是在科学界全不著名的人物,平凡的人物,实践家,工作革新者。”^②我国去年大跃进以来,在农业、工业、医疗等方面的許多实践的成就和发明創造,打破了不少科学上的陈腐观念,这些事实十分生动地表明了生产实践在推动自然科学前进中的巨大作用。

自然科学以生产实践为基础,但生产实践的經驗并不就是科学。自然科学要把生产实践的經驗加以总结和概括,使之上升为理論,然后反过来用理論来指导生产

实践。自然科学理論指导生产实践又为新的实践經驗所修正、丰富和发展,然后在更高更广的角度上来指导生产实践,如此往复不已。这就是自然科学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道路。

生产的发展不仅給自然科学提供丰富的实践經驗,而且提供日益丰富的研究材料。自然科学从整个自然界中取得自己的研究材料。但是,自然科学并不是脱离生产实践来靜观地研究自然界,而是首先从生产实践中来研究自然界,研究人在生产活动中所改造的自然界。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和材料,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日益扩大和丰富起来的。正如恩格斯所分析的,十五世紀以来的欧洲,工业巨大地发展起来,产生了很多力学上的(紡織、鐘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透鏡制造)新事实,这些新事实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近代力学、化学、物理学便是在研究由于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材料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

由于生产的发展,人的活动領域也越来越扩大,人所接触的自然界的范围也越来越扩大。十五、十六世紀地理上的发现,为当时的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

^① 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斯达汉諾夫工作者会議上的演說”,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5—16頁。

^② 斯大林:“在克列姆林宮招待高級学校工作人員时的演說”,“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0頁。



体的)方面展示了无数前所未有的材料。只有在这样广大范围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概括,后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才有可能产生。现在,人类正向宇宙空间跨出了第一步。随着人类日益征服宇宙空间,自然科学只能从地球上获得研究材料的局限性将被大大突破。可以预计,从宇宙空间将要获得的大量材料,会把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二) 生产的状况决定了自然科学研究的物质技术条件。

正如使用什么样的工具进行生产,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使用什么样的仪器设备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自然科学发展的水平。没有望远镜就没有近代天文学。没有显微镜就不可能发现细胞和细菌,也就不会有近代生物学和医学。而望远镜和显微镜最初都是透镜制造业的产物。现代各门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更是取决于许多复杂而庞大的实验技术设备。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物理学的研究所需要的强大的加速器,要用数万吨重的电磁铁和其他极复杂的电气工程和无线电工程的部件,以及每秒能抽出空气几万公升的强大抽真空设备。高空和宇宙空间的研究所需要的人造卫星和火箭,更要有冶金工业、无线电工业、高能燃料化学工业和计算技术等一系列生产技术的高度发展。除了这些尖端部门以外,几乎现代所有各门自然科学的实验室,都日益以各种电子学仪

器、光学仪器装备起来。技术科学各部门往往需要建立相当规模的实验基地。适应着这种需要,现代工业中甚至分化出了专门生产供科学研究用的仪器、设备、试剂、特殊材料的部门。

(三) 生产的需要是推动自然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

恩格斯说,“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往后越来越是自然知识进展的主要动因”^①,“如果说,象您所断言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科学状况,那末科学状况却就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了。社会方面一旦发生了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数个大学更加把科学推向前进。”^②恩格斯是从对自然科学发展历史的分析中得到这个结论的。他指出,古代天文学最早由于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定季节的需要而产生;古代力学由于手工业发展、航海和战争的需要而产生;古代数学也是从丈量地段面积、衡量器物容积、计算时间等实际需要中产生的。他还指出,整个液体力学是由十六和十七世纪意大利治理山洪的需要所引起的;对于电,只有从电在技术上有用的性能(电池、电解等)被发现时起,人们才得到了一些合理的概念。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材料:十七世纪机器的应用,刺激了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95页。

^② 恩格斯:“致亨·施塔耳肯堡”,同上书,第504页。



近代力学的发展；金属生产发展的需要，使化学转向矿冶事业而从炼金术中解放出来；蒸汽机的应用和提高热机效率的追求，促使热学的迅速发展；近代力学、特别是研究运动状态的力学的需要，又推动了变量数学和函数概念的产生，开辟了高等数学的新阶段。生产的需要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是十分明显。例如，航空工业和火箭发展的需要，推动空气动力学和材料力学的迅速发展；利用原子能的需要，促进原子核物理学、放射化学、放射生物学的巨大发展；新技术对于具有特殊性能的材料的需要，引起了对稀有元素及其合金的研究；雷达、通讯和自动控制的需要，推动了无线电电子学、半导体物理学和化学、信息论和控制论的发展；技术和物理上的需要，成为计算数学、概率论、数理逻辑等一系列数学部门发展的动力。

当然，自然科学并不仅仅是被动地适应生产的需要。自然科学满足着生产实践中提出的需要，同时，它又以自己的发现为解决生产需要开辟新的途径，引起新的生产需要。例如，首先是自然科学研究清楚了电磁现象的规律，发现了在技术上利用电能（发电机、电动机）的可能性，然后才引起了在生产中运用电能的需要。又如，首先是自然科学研究清楚了原子核反应的规律，发现了在技术上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然后才引起了在生产中运用原子能的需要。这两个例子的情况，同热能研

究的情况便稍有不同。在热能研究的情况中，首先是生产中运用了蒸汽机，由于提高热能利用效率的需要，推动了自然科学关于热能转换规律的研究。但是，无论是电学的研究，还是原子的研究，它们都是因为初步的研究成果显示了在生产中应用的端倪，然后才在生产的需要的强烈推动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些例子并不是否定了，而是恰恰证明了生产的需要对于自然科学发展的决定作用这一根本原理。

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生产的依赖关系的各个方面，简单的分析便是如此。

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生产的依赖关系这样一个根本的规律性，是由马克思主义最彻底、最充分地加以阐明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这个原理，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理解整个自然科学历史的钥匙，而且帮助我们自觉地遵循和运用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来正确规定我们现在自然科学工作的目的、任务和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生产的大跃进，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给予了极巨大的动力，提出了极迫切的要求。自然科学必须为生产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必须密切联系生产实践，总结生产实践的经验；必须积极地解决经济建设提出的各种科学研究任务，满足生产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必须反对脱离生产实际、为科学而科学的倾向。这便是我们应当作出的结论。



自然科学的发展对 生产的相对独立性

在分析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生产的依赖关系的时候，我们还应当看到，自然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活动，还有它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当然，自然科学发展对于生产发展的独立性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此，首先要强调自然科学发展对于生产的依赖关系，强调生产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动力，它决定着自然科学发展的趋势、方向、速度和限度，即决定着自然科学发展的总进程。下面我们根据这个基本观点，仅就科学实验的作用和理论研究的作用这两个问题，对自然科学发展对于生产的相对独立性，作一点简单的分析。

（一）关于科学实验的作用问题。

社会实践是认识活动的基础。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自然科学认识活动首先是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但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毛泽东同志在提到主要的几种社会实践过程时，在物质生产过程和阶级斗争过程以外，还提到了科学实验。科学实验是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是自然科学认识活动的一种重要方法。自从近代自然科学中运用了实验方法，自然科学就开始不仅从生产实践中、从对自然界的直接观察中获得材料和经验，而且还从实验室里获得材料和经验，从而大大扩大了自然科

学认识活动的实践基础。在实验室中，人们处理的是人所控制下的自然过程，或简化了的、缩小了的生产过程；人们撇开了所研究的现象中的一些偶然的、次要的因素，控制着一些因素，变化着一些因素，增添一些因素，减掉一些因素，从而对各种因素进行分析、比较和综合。而在自然条件或生产条件下，各种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这种分析、比较和综合有时便难于进行。在实验室中，人们创造了许多特殊的自然条件（如特殊的高温、高压等等），研究着在地球表面的自然条件下没有的、或不常有的自然过程；人们运用了各种大大扩大了人的感官能力的研究工具；人们还利用了一些比较方便的实验材料（如利用繁殖很快的生物来研究遗传现象），等等。这样，人们在实验室中，取得了大量的材料和经验，这是从生产实践和直接观察中得不到或不易得到的。这就使得自然科学有可能凭借实验室中的材料，超过生产实践所提供的材料基础，走到生产实践的前面，更深入地进行理论研究，揭示自然的规律，为生产开辟新的途径。由此可见，实验方法在帮助自然科学的研究对于生产实践获得更主动的地位，获得较独立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各门自然科学同生产实践联系的情况不一样，研究对象的复杂程度不一样，理论发展成熟程度不一样，以及实验方法发展水平不一样，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在各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例



如，在现代物理学中和在农业科学中，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的作用便是不一样的。随着实验方法的进步，作为一个总的趋向来说，科学实验的作用总是愈来愈大的。

当然，我们不能把科学实验同生产实践对立起来，脱离开来，而是应当把它们联系起来，看到它们之间的互相补充、互相发挥与互相促进。那种以为有了科学实验，自然科学便无需依赖生产实践了，生产实践对自然科学便没有什么意义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无论如何，科学实验只是研究的方法，不是研究的目的。自然科学的研究，连同它的实验方法，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服务于生产实践。科学实验只是扩大了自然科学的实践基础，决不能排除生产实践成为自然科学的唯一的实践基础。从少数的实验中得到的经验和材料，决不可能完全代替从大量的、十分复杂的生产实践中得到的丰富多样的经验和材料。从实验中得到的知识，当它运用到复杂的生产过程中去的时候，还需要由生产实践的经验来复核、丰富和发展；把生产实际情况简化了和缩小了的实验室的研究，还要同中间工厂的试验研究、同生产现场的研究结合起来。而科学实验水平的发展，归根到底，又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取决于生产所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

(二) 关于理论研究的作用的一些问题。

认识有待于深化。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经验积累上升到理论概括，

由较低程度的理论概括上升到较高程度的理论概括，由零散的知识上升为概念和理论的系统，这是认识活动逐渐深化的过程。自然科学中有些理论概括程度较高、范围较广的研究工作，看来似乎并不与这项或那项具体的生产需要发生联系，似乎只是为了理论本身的需要，理论的系统化、理论基础的阐明的需要。例如，门捷列夫关于化学元素周期律的理论概括工作，并不是为了解决某一项具体的生产需要而进行的，它的直接目的是满足教学上的需要——将化学知识系统化以便对学生作最清晰的阐述。但并不能因此便认为这种理论概括工作是同生产实践无关的。首先，理论概括要以足够的材料积累为前提。正是在生产需要的推动下，在生产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某些自然科学部门才逐渐积累起足够的材料，产生了进行理论概括的必要与可能。只是由于矿冶工业、化学工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化学在这些生产的需要的推动下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积累了足够数量的关于化学元素的知识的时候，化学元素周期律这样一个巨大的理论概括才有必要和可能。门捷列夫是在一八六九年作出周期律的理论概括的，那时化学中已经积累了约六十种元素的知识（自然界存在的元素约九十种）。在十八世纪便不可能作出这个理论概括，那时化学中知道的元素不过十几种。其次，理论概括虽不是直接为了满足这项或那项生产的需要，但它使人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大大深



入一步，从而对于生产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門捷列夫关于周期律的理论概括，成为现代化学和物理学的基础，至今在原子能利用，半导体技术，寻找和利用矿产资源(地球化学)，制造在新技术上特殊需要的金属和合金材料(稀有元素化学)等重要方面，都具有理论指导的作用。

理论概括的过程，是一个认识活动内部矛盾发展的过程。这里包含着新的事实和旧的理论、概念、假设之间的矛盾，解释着这一些事实的理论、概念和解释着那一些事实的理论、概念之间的矛盾，解释着同一些事实的不同理论、概念之间的矛盾，等等。理论的发展便是通过这些认识活动内部矛盾的不断揭示和不断克服来实现的。认识内部矛盾发展的需要，推动人们去研究那些为现有理论所不能解释的新事实，去发展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些事实。这些新事实的研究并不一定直接与这项或那项生产的需要相联系，但它是认识内部矛盾的焦点，解决这个矛盾便能把认识大大推前一步，因而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例如，量子理论便是从研究黑体辐射能量的频率分布这个令人寻味的为旧理论所解释不了的事实中诞生的。新理论的诞生成为物理学的新阶段的起点，人对自然的认识开始从宏观的领域推进到微观的领域。今天的新技术的奇迹，不论是原子能还是半导体的应用，离开这个由此发轫的新物理学，都是不可思议的。

在理性认识阶段，推理过程是一个重

要的認識过程。从现有的理论和概念出发，经过逻辑推演或数学推导，经过各种理论和概念的交相接触，人们可以获得新的理论、预见新的事实。当然，推理过程并不是与实践无关的，它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因为，作为推理的出发点的现有理论和概念是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推理所依据的逻辑或数学规律也是从实践中概括出来、反映了客观事物间的关系的。特别重要的是，从推理中得到的结果，必须到实践中去检验，去证明或推翻。例如，第一个反粒子(正电子，即同普通的带负电荷的电子相反的、带正电荷的电子)的存在，便是由于把相对论概念引进量子力学中，建立了描述电子行为的相对论量子力学方程，然后从这个方程出发，经过理论推导而预见出来的。这个预见在当时甚至显得是不可理解的。但后来相继在实验室中和宇宙线中发现了正电子，这就从实践上证明了理论预见的正确。罗巴切夫斯基几何的建立，是理论推导作用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从理论上探讨欧几里得几何的基础(公设系统)的过程中，罗巴切夫斯基取消了欧几里得几何的第五公设(即通过一点对一綫只能作一条平行綫的公设)，然后从理论上推导出了第一个非欧几里得几何系统。从非欧几里得几何中得到的结论，许多在当时也是显得不可理解的。但是，新的几何系统后来在相对论中得到应用，并且在天文学的观察材料中得到了检验，这才证明了它的确是客观世界的空间形式的反



映,而不是純粹的虛构。这样,由于在物理学中应用的需要,它就大大发展起来。在这里有一个事实的对比,很足以說明实践对于从推理中得到的新理論的发展的決定作用,这就是:从推理中得到的非欧几里得几何,由于实践的証明和实际应用的需要而大大发展起来,但同样是从推理中得到的另外一些几何系統(如非阿基米德几何,非戴扎格几何),由于沒有得到实践的証明和实际的应用,始終沒有得到什么发展。

最后,在分析理論的作用的时候,还应该專門討論一下若干基本理論研究的意义。目前,关于物質基本粒子的研究,关于生命起源和生命本質的研究,关于意識的起源和意識活动的机制的研究,关于遗传机制的研究等等,都属于这类基本理論研究的范围。人們对于自然規律的認識,常常只有达到了較为深入、較为成熟的时候,才能被用来按照人們的願望改造自然,才能在生产中發揮巨大作用。但人的認識总是由浅入深,由少到多,由探索趋于成熟的。当对某方面的自然現象与規律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的时候,人在这些自然現象和規律面前便还是比较无能为力的。当对某些自然过程的研究还处在搜集材料的阶段,还没有发展到整理和概括材料的阶段,或者还只是从表面上概括了一些現象的規律,但还没有深入到这些过程的内部机制,或者虽然闡明了这些过程的内部机制,但还没有找到控制和影响这些机制的有效方法的时候,这些自然科学研

究便还不能用于生产,或对于生产还不能有极大的帮助。前述的那些基本理論的研究,目前大体上都还处于这种不成熟的阶段。然而,尽管这些研究在今天对于生产还不能起多少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关于基本自然規律的研究經過逐步探索,一旦达到成熟的阶段,就会使人对自然界的認識大大提高一步,使人对自然界控制和改造的能力,大大提高一步,从而对生产发生巨大的作用。关于原子的研究的历史,最令人信服地說明了这一点。四、五十年前,人們对于原子的研究,还处于摸索的阶段,对于原子内部的情况还知之很少、很浅,那时关于原子的科学研究,也看不出对于生产有多少作用。但随着人們对于原子内部結構、原子变化規律的研究的逐渐深入和成熟,并且找到了控制原子变化的方法,結果终于取得了在生产中运用原子能这样极其重大的实际利益。以几十年前的原子的研究,来对照今天基本粒子的研究和其他的基本理論方面的探索性的研究,便可以充分表明这些研究的重要意义。

基本理論研究的意义,除了从它們日后可能对生产发展起重大作用这个角度,即自然科学同生产的联系这个角度来考察以外,还应当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自然科学同哲学的联系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关于宇宙、物質、生命、精神,这些根本問題,历来是科学与宗教、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激烈斗争的場所。因此,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关于这些根本問題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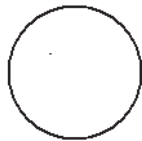
从支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服务于思想斗争的实际任务的角度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上我们就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的作用这两个方面，讨论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生产的相对独立性的一些问题。这种相对独立性是客观存在着的，我们必须承认它，并正确地认识它和对待它。必须反对夸大和歪曲这种相对独立性，从中得出结论说：自然科学与生产没有什么关系，自然科学只是实验室里的事情，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与解决生产实践的任务毫不相干，理论的发展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它只是各种概念和定理的纯粹逻辑推演的结果，只是少数科学天才的偶然灵感的产物，等等。这是一种对待自然科学发展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成为“为科学而科学”的错误倾向的理论根据。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具体地说明，这种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完全错误的。当然，在反对前一种错误倾向的时候，也应当注意，不要采取简单化的办法，走到另一个极端，误以为实验室里的科学研究都是脱离实际的，误以为理论的研究必须全都直接地同解决生产实践中的任务联系起来，必须全都结合当前生产的需要，必须全都立即对生产实践发生作用。我们党历来在强调自然科学必须为生产服务，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时候，同时指出必须防止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化的理解，必须重视理论的研究、重视满足长远的生产需要的研究工

作。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就曾经指出：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今年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又指出：在科学技术上“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的任务，应当放在首要的地位。在生产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存在着千千万万的技术课题，科学技术工作者应当分工协作，为解决这些课题而努力。尖端科学技术也必须注意发展；对于条件还不具备的，目前应当从各方面准备条件。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根据这些指示，正确地理解自然科学与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全面地安排科学研究工作，就会使我国的自然科学健康地发展，对当前和长远的生产发展作出最大的贡献。

更 正

本刊一九五九年第九期第十一页右栏末行的“百分之二百五十”，应改为“百分之三百五十一”；第十二页左栏倒数第三行的“97.43%”，应改为“86.23%”。



指标要切合实际

許 辛 学

过去半年的生产发展情况表明，今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将实现一个新的跃进。全国很多的单位，都提出了很高的生产计划指标，并且正在千方百计地为实现这些指标奋斗。在去年大跃进的巨大成就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依靠干部和群众的团结一致、和衷共济、艰苦奋斗，一九五九年必将成为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的一年。

为了实现跃进，一切企业的指标必须是经过巨大努力才能实现的指标。指标低了，不足以刺激人们的努力。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指标当然也不应当过高，不应当高到脱离实际的可能，以致人们虽然努力仍然不能实现的那种程度。那样的指标同样不足以刺激人们的努力。因此，定出正确的指标并不总是很容易的。这也往往需要经过一些反复。

最近，有些工厂、矿山和基本建设单位，有些人民公社，根据今年前五个月执行计划的经验，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讨论了今年的生产、建设指

标，把一些原来不切合实际的指标作了适当的调整，对这些单位的工作产生了良好的结果。我们认为，采取这样的步骤是正确的，它不但不会妨碍跃进，而且正是保证了跃进的实现。

指标不切合实际，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指标过低，落后于客观的可能性；另一种是指标过高，超过了客观的可能性。前一种情形，即指标过低的情形，经过一九五八年反对右倾保守的斗争，和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实际生活的教育，已经大为减少，但是也不能说已经没有了，或者以后不会再出现。不过，当前也有不少另一种情形，即指标过高的情形。人们希望把事情办得多一些，办得快一些，这种心意是好的，值得称许的。但是有些人由于对当前客观条件的认识不充分，却使指标超越了客观条件的可能限度。这种过高的指标，同过低的指标一样，既然都是脱离实际的，都会脱离群众，都会对工作造成损失。因此，指标定得偏低的，应当根据实际的可能，



适当地提高；而指标定的偏高的，也应当按照实际的可能加以调整，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落实”。

人们的主观认识必须通过实践才能一步一步地接近客观实际。拿经济工作来说，在实践的过程中根据实际的情况和经验，调整某些单位的计划指标，这样的事情是难以避免的，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从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不久的国家里是如此。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指出的：“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

把指标“落实”，使之合乎实际，不但

不会妨碍群众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提高群众的积极性。也就是说，指标落实了，群众的干劲不但不会小，反而会更大。例如，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钢厂，这个厂子在过去几个月中，职工的干劲原来很足，但是由于原来的生产指标定得偏高，计划完成得不够好，结果是上下心情不舒畅，感到“包袱”很重。后来，企业的领导人员和职工群众一起，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修订了生产指标。这样，职工群众的干劲比原来更高了，产量步步上升，质量日有改进，超额完成了计划，比修订指标以前的实际产量有了很大的增长。由此可见，并不是任何高指标都能够保护群众的干劲；只有那种符合于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的高指标，才能鼓足群众的干劲。

事实上，脱离了客观可能性的过高指标，不仅会妨碍群众的积极性，而且就企业来说，还可能使人们片面地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和品种，忽视设备的维护和检修，忽视生产的安全，以至引起生产中的某些失调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一种事与愿违的结果：本来要快，结果反而慢了；本来要增加生产，结果反而不利于生产了。相反，只要把过高的指标调整到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程度，我们就可以站得更稳，把工作做得更切实，也就有可能前进得更快，前进得更好。

指标的高低，首先不决定于人们的主



观愿望，而决定于客观的可能。当然，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改造客观世界，是有极大的作用的，我们决不当把人的努力和客观可能对立起来。任何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过低估计，都会产生错误。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要真正发挥积极作用，只有当人们正确地认识了客观条件，并且懂得怎样有效地改变客观条件的时候，才有可能。

有一些人对于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有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就是把客观条件绝对化，认为人们对它是无能为力的，它是不可改变的；或者，只看到困难的条件，甚至夸大这种困难条件，而看不到已经大量存在的和正在出现的有利条件，也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片面的观点，当然是不正确的，是必须纠正的。但是，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决不是说可以不认真地研究客观条件。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应当既研究有利的条件，又研究困难的条件；既研究先进环节的情况，又研究薄弱环节的情况；既研究国民经济一个部门和一个环节的个别条件，又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一个部门内部的综合条件，包括协作的条件在内；既研究将来可能利用的资源条件，又研究现时可以实际利用的资源条件；既研究劳动力的条件，又研究生产设备的条件，而就前者来说，还要进一步地研究劳动力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合理分工，研究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

动在工业中的经济效果，就后者来说，也还要进一步地研究设备的配套和备份，维护和检修，*研究原有设备和新增设备可能增加生产能力的情况；如此等等。把各种客观条件的可能性同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这样来确定我们的任务和指标，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采取的方法。按照这样的原则，人们就能够定出正确的、既不偏低又不偏高的指标。按照这样的原则，人们就不至于以为任何企业的生产必须每年翻一番才算跃进，以为一个工业企业或农业企业每年增产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不算跃进。大家知道，周恩来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对于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已经正确地批评过了。

毫无疑问，一个企业在调整生产指标的时候，必须坚持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凡是可以实现的高指标，就必须争取实现，不去争取就不对；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必须努力去办，不努力去办就不对。在那些需要调整生产指标的企业中，只要领导人员全面地研究具体情况，密切地依靠广大群众，这些单位就一定能够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之下，顺利地解决调整指标的问题，从而在可靠的基础上胜利地实现工农业生产的继续跃进。



②*②*②*②*②*②*②*②*②*②*②*②*②*②*②*②*

关于写文章

·施东向·

写文章，是交流思想、传播经验的一种方法，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还应当指出，写文章同时又是整理我们的经验和思想，使之明确化、条理化的一种方法。

古时候中国人对于写文章有两个基本要求，叫做“有物有序”。“有物”，就是要有内容；“有序”，就是要有条理。

要写一篇文章，总是在作者的头脑里已经有了一些值得写出来的东西；或者是在工作中积累了某些经验，并且认真地考虑和总结了这些经验，或者是对于某个问题做了研究，达到了一定的结论。但是写文章并不只是把在头脑里的思想搬到书面上去的一个简单过程，而且又是这个思想逐步成熟、逐步完善起来的一个过程。

一般说来，一种思想只是在自己头脑里的时候，还不一定十分明确。把它说出来让别人听懂，这就比较明确了。写成文章，那就是更进一步了。每一个字，每一

句话，以至每一个标点，都摆在纸上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到底是清楚还是不清楚，是深刻还是肤浅，是严整还是杂乱，立刻都明白显示出来了。要写好一篇文章，就要讲究章法，也就是要考虑如何开头，如何结束，如何分层次，分段落，这实际上就是整理自己的思想，取得必要的条理。有时为了表达一个意思，要费许多周折，这往往是因为这个意思在自己头脑里本来还是比较模糊的，而在找到了最恰当的字眼和语句来表达的时候，这个意思才真正明确起来。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写不下去的情形，这是好事，因为这就暴露了需要解决的矛盾。写不下去的原因，有时是因为我们对于书面语言这个工具还没有很好地掌握。但有时，并不是因为缺乏表达能力，而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还不够成熟。自己虽然觉得已经弄通了，但其实这种思想还是比较杂乱，比较暧昧的，或者还只有个粗糙的轮廓，其中细节还很不周到。在这种情形下，当然写不成好文章。但是如果不写，也许还不能发现这种情形。

遇到这种矛盾怎么办？最好不要急于写下去。这时候，就应当进行各种必要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看书，和别人讨论等等），继续酝酿，继续思索，继续研究，使自己的思想脱离那种暧昧、混乱和粗疏的状态。材料充分了，观点明确了，论据完备了，条理清楚了，然后才能写好改好。



有时我们研究一个问题，起初未必能预见到它的广度和深度到底如何，到了写不下去的时候，才意识到它的复杂性。所以写作过程常常能引导着我们的思想进入新的境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苦恼和喜悦，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是常常会经历到的。

“下笔千言”，“一挥而就”的情形也许是有的，但如果不是粗制滥造，那至少要有这两个条件：第一是对书面语言这种工具十分熟练，能够运用自如。第二，更重要的是，所表达的思想已经预先酝酿得十分成熟，连一切细节都考虑到了。但是，事实上对于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要求是无止境的，即使一次能写成的文章仍然可以继续加以修改。通常我们写成一篇文章，总是要经过反复的推敲、修改，甚至几次重写。这是为了使我们的思想取得最适当的表现形式，而且还是为了使这种思想愈来愈明确和完备。

这样看来，把一个思想用文章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过程，如果用个比喻来说，就好像一块生铁反复地经过锤炼一样，——结果就成了熟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用写文章的方法来锻炼我们的思想，提高我们的思想能力的缘故。当然，必须是用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写文章，才能收到这种效果。如果马马虎虎、随随便便，那就既起不了锻炼思想的作用，当然也谈不上交流思想、传播经验了。

所以，我们反对不严肃的写作态度。

如果不管自己有没有值得写出来的东西，也不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明确化，条理化，只是硬着头皮写下去，而且写出来就要发表，这种连作者自己也不知道是说些什么的文章，只能使人看着头痛，看罢后悔，是毫无可取之处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提倡大家来学习写文章，并且努力写出好文章来。不要因为自己的思想能力不高就不敢写文章，而应当用写文章的方法来训练自己的思想。一个人如果不努力把自己所有的某种思想清清楚楚地写出来，甚至也不努力把这种思想清清楚楚地说出来，那么这种思想实际上只是处于混沌的状态中。

为什么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应当尽可能把经验总结写成文章呢？除了要把经验告诉别人以外，还因为写文章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总结经验，以至使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

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当然更是离不开写文章。他们应当把研究成果写成文章，而且应当通过写文章来检查自己的成果，并且督促自己不断地提高研究水平。

好文章是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经过踏踏实实的研究才能写出来的。这种文章在义理、考据和辞章等方面，总是经过认真努力的。当然，要把文章写好，需要一个过程。起初写的文章不一定就很好，但只要经常地认真写下去，总是可以写好的。



治水工作的辩证观点

李凡夫



唯物主义辩证法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最一般的发展规律的反映。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我们能够依靠辩证法这个武器，去找到工作的具体规律，并正确地加以运用，就能把工作做好，取得胜利。治水工作当然也不是例外。

人类和水灾作斗争，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我国大禹治水的故事，虽然属于史前的传说，但留传如此普遍与永久，不是偶然的。治水与我国人民的生存，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人民从来就非常重视治水的问题。从“左传”等古籍中可以看到，古人对大禹非常崇敬，认为没有禹，人们都变成鱼鳖了。安徽怀远县涂山上有一座禹王宫，据传已有很久的历史，历代都重修过，在解放前每年有两次庙会，每次到山上朝拜的群众很多。当地有些居民还能讲大禹治水的传说，说大禹在这里治理过淮河，凿通了荆、涂两山，使来自桐柏山的洪水流出去，等等。

我们的祖先经过长期对水的斗争，积累了不少治水的经验。据“江南通志”记载：“春秋时，阖闾伐楚，用伍员（伍子

胥——引者注）计，开渠运粮，今尚名胥溪（这是一条与荆溪联结，沟通太湖与石臼湖、丹阳湖以及长江的一条河——引者注）……自是湖流相通，东南连两浙，西入大江”（尹继善等修：“江南通志”，卷六十一，河渠志）。这就是说，在两千多年前，江南地区已有人开挖比较大的河道了。现在江南纵横交错的水网，就是劳动人民长年累月的辛勤劳动造成的。但是，在剥削阶级统治下的社会里，由于剥削阶级只顾少数人的利益，漠视广大人民的利益，不可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更谈不到自觉地利用客观规律来为人民谋福利。据历史记载，淮河原来是一条美丽的利多害少的河流，后来由于黄河屡次夺淮，到明朝、清朝以后，河道更加淤塞，统治阶级又不重视修理，于是水灾频繁，淮河流域成了多灾多难的地区。到了国民党统治时代，情况更糟。他们以“导淮”为名，滥借外债，搜刮民脂，用来镇压革命，养肥四大家族。这样，搞了二十来年的“导淮”，毫无结果。真正自觉地利用水的客观规律，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



来防治水患，兴修水利，为全国人民谋福利，是在解放以后才逐渐实现的。

解放九年多来，安徽省在中央的领导下，对治水进行了全面规划，全面治理，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安徽境内，沿江有巩固的江堤，山地有无数的水库，平原有密布的河网。仅长江沿岸修筑江堤，就已完成土方一亿零二百八十万公方，石方五十八万公方。在水库建设方面，全省已建成大型水库四座，即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磨子潭水库、响洪甸水库；中型水库五十六座；小型水库三千五百四十六座。全省水利工程可以使五千五百多万亩地得到灌溉，大型水库的发电能力是

十二万七千瓦。

在治水工作中，最艰巨最复杂的是解决淮北的水利问题。我们党总结了过去治淮的经验教训，又经过几年实践的摸索，逐渐认识了治淮的规律，并根据这个规律制定了一套治淮的具体方针。这套方针就是：以群众自办为主，政府支持；以小型工程为主，大中型工程支持；以蓄水为主，多蓄少排；防洪与治涝相结合；治水与改种水稻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其具体办法就是河网化、水稻化。其奋斗目标就是把淮北变成江南。自从有了这套具体方针以后，淮北水利工作就有了重大的进展。过去淮北不但旱和涝的问题长期无法



移山造海（木刻）

王倩



解决，而且也不可能多种水稻这种高产作物，因为一般在六月以前需要水的时候没有水，六月以后雨水又太多了。河网化把这种自然条件根本改变了。一九五八年是淮北河网化大规模施工后的第一年。虽然只完成了土方约四十亿公方（总任务约九十到一百一十亿公方），但是，在改种水稻、抗旱、除涝、增产等各方面，都显示了巨大的作用。一九五八年淮北改种水稻的总面积达五百二十四万亩。在六月以前干旱的时候，利用河网吸取地下水灌溉水稻，在六月以后雨量多的时候，利用河网拦蓄多余的雨水，这就保证了稻子的正常生长，使水稻获得了空前的丰收。阜阳专区过去是常常依靠政府救济的地区，被人们看作是国家的“包袱”，现在这个“包袱”已经变成粮仓，今年已运出大量粮食来支援全省和国家的建设事业。我们最近访问过阜阳专区阜阳县的程集、阜南县的柳林、涡阳县的纪伦寨、蚌埠专区濉溪县的臥龙湖、宿县的紫盧湖等人民公社，看到那里河网化的工程有的已大部分完成，有的已完成一半。淮北真是今非昔比，不仅河渠纵横，绿树成荫，不减江南景色，而且过去的荒草湖和低洼地都已经变成鱼米之乡了。在短期间内按计划挖成的河网，比起江南在漫长岁月中自流地形成的水网，更加美观、更加有利于生产和交通运输。淮北的河网化，不但使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生产起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大大改善了人民生活。过去群众一般吃不上大

米饭，现在吃上大米饭了；过去吃鱼很少，现在经常可以吃到鱼了；过去穿得很破烂，现在穿得较好了。当然，更大的变化还在后头。

我们认为，淮北治水的经验，不仅在实践上有重大意义，而且在理论上也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概括。我在这里只谈几点初步的体会：

第一，解决任何问题，不仅要知道一般的规律，而且还要找到事物的特殊规律。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虽然是研究战争，但是我们认为，研究战争是如此，研究其他工作也是如此。在最初几年的治淮工作中，有些同志没有运用这种思想方法，去研究淮北的特点。淮北广大平原，地势低洼，天晴则旱，天雨则涝。过去有人用三句话来概括淮北的特点，就是“小雨小灾，大雨大灾，不雨旱灾”。在这种情况下，要根治淮河，就必须解决两方面的问题，就是既抗旱，又防洪、防涝。有些同志对这些特点认识不够，所以也就不能找出治淮的特殊规律。他们只因袭治水的传统观念，认为治水就是防洪，就是把水排泄出去，只要保证洪水不冲破堤防，只要下雨后能



把水排出，就算完成了治水的任务。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只注意防洪和泄水的思想，而忽视了群众除涝和抗旱的要求。他们沒有注意到，在安徽涝灾比洪灾的威胁还要大。洪水之害虽然严重，必须治理，但不是年年都有洪水；而涝灾在淮北则是年年不断。如果不把防洪与除涝结合起来，就不能解决淮北的治水问题。同时，涝灾与洪灾本身是连在一起的，积涝成洪，洪中有涝，先涝后洪，都是常常发生的。这种情况，他们都没有注意。他们也没有注意到抗旱的重要性。据历史记载，两千年来，沿淮地区大小灾害九百八十多次，旱灾约占一半，如果只注意泄水，而不想到蓄水，就不能解决抗旱的问题，更不能解决把低产地区变为高产地区的问题。我们只有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才能找到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同志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情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治淮的经历，又一次证明这是一条普遍真理。只有当安徽省委根据中央“根治淮河”的方针，研究了当地的具体情况，反复与群众商量，总结了群众的治水经验和创造，才认识了治淮的特殊规律，并根据这个规律制定了治淮的具体方针，这样，才取得今天的成就。

现在，不仅在平原地区已初步形成了

河网，而且在安徽许多丘陵地区也开始挖了不少新河和渠道。平原地区的治水方针，在丘陵地区也是适用的；但在具体做法上，又必须注意到丘陵地区的特点。丘陵与平原不同，不但地势有高有低，而且也没有平原那样丰富的地下水。因此，在丘陵地区治水，一般不能先挖河，而要先修水库和河坝，把水拦蓄起来，然后才可挖河，河网必须与水库相结合，还要与外水相衔接。这就是丘陵地区治水的特点。根据这个特点，丘陵地区治水的方法是：沿山修水库，大库套小库（在丘陵的冲子里也可以修水库）；拦河打坝，坝下开渠，渠下挖塘，塘下挖沟，洼地打围；在适当地点按等高线开挖新河和横向的沟渠。这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水利系统。定远县蘆桥八一人民公社，就是采取了这种治水方法，获得了重大的成就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对立的统一。它们是互相区别的，同时又是互相渗透和互相联结的。平原地区的治水经验，对所有平原地区来说具有普遍性；对于非平原地区来说，则具有特殊性。反之，丘陵地区的治水经验，对所有丘陵地区来说具有普遍性；对于非丘陵地区来说，则具有特殊性。丘陵与平原，除了不同点之外，又有共同点，因此两种地区的经验也可以互相参照。还要看到，在特殊之中还有特殊。同是平原，也有不同的地形，所以挖河网的方法就不应完全一样；丘陵地区的地形更加复杂，因此，丘陵地区治水，除了有



共同的方法之外，还应有多种多样的不同方法。毛泽东同志说：“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矛盾论”）我们在研究问题时，应当充分注意到这两方面的不同而又互相联结。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只满足于事物的共同规律，不了解事物的特殊规律；或者只满足于事物的特殊规律，而不了解事物的共同规律；或者不能把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联系起来去考察，都不能完满地解决问题，做好工作。

第二，在治淮这件复杂的工作中，包含着许多带关键性的问题，需要正确地加以解决。主要是：在依靠谁的力量方面，是群众为主还是政府为主的问题；在水利工程上，是大型为主还是中小型为主的问题；在水的处理方面，是蓄水为主还是泄水为主的问题，等等。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治水工作的速度和效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过去在这些方面是存在着意见分歧的。一种意见，主张依靠群众为主，政府支持，小型为主，大型为辅，蓄水为主，多蓄少排；另一种意见，则主张主要由政府包办，搞大型工程，泄蓄兼顾（实际的做法是多泄少蓄）。这是关于治水工作的两种方针的争论。这个争论差不多经过了八年之久，错误的意见，才最后被克服。在事后看来，似乎问题很容易理解，但是

真理在没有得到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以前，人们是不容易相信的。就拿依靠群众为主还是依靠政府为主这个问题来说，我们都会知道，一切工作都应该依靠群众。但是有些同志一遇到实际问题，却不依靠群众，不总结群众的经验，而单纯依靠政府拿钱，依靠少数专家办水利。当然，水利工作必须依靠政府领导，也需要政府拨款给以支持，尤其是兴建某些大型工程，政府拨款就更为必要。同时，水利工作，特别是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没有技术专家的指导，也是不行的。但是，要真正解决广大地区的水利问题，要在广大地区实现河网化，主要还是依靠群众的力量。群众不但有力量，有智慧，而且有经验。他们在长期与水灾作斗争中，对水的情况也最熟悉，正如古语所说：“近水知鱼性，居山识鸟音”。如果我们不与群众商量，不调查研究，不总结群众的经验，而只依靠政府和少数专家办水利，就不可能提出河网化的方针。河网化的概念，就是由于依靠群众，根据群众的要求，总结群众的经验而形成的。我们党为了解决淮北的涝灾问题，首先研究了江南多雨不涝的道理，研究了水网、圩田、耕作方法与治水的关系，因而在淮北提出了种水稻的问题；在旱灾严重的时候，又深入调查了地下水的情况，因而又提出多挖水井和河沟，充分利用地下水源，后来又逐渐发展为河网化的思想。而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与群众商量。至于河网化的实现，需要



开成千上万条沟渠，挖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土方，更不用说，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办到。

在依靠群众为主还是依靠政府为主，大型工程为主还是中小型工程为主，蓄水为主还是泄水为主等等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依靠群众为主还是依靠政府为主的问题，占着首要的地位。有些同志由于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和智慧，也就不愿在水利工程的兴建上以小型为主；由于不愿以依靠群众为主，以小型工程为主，也就不能解决广大地面上的蓄水问题，在水的处理上，也就不会以蓄水为主。以蓄水为主还是以泄水为主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据“史记”和“尚书”记载，泄与蓄的争论，远在大禹的父亲时就开始了。大禹的父亲名鲧，主张用“湮”的方法，即堵塞的方法，因治理无效，被流放到羽山去了。大禹否定了他父亲的方法，主张用“导”的方法，即疏导排泄的方法，治水有功，因而获得了极高的荣誉。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变化，大禹的主张一直占着优势。解放后还经过几年的争论，直到最近，我们才给他的主张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我们主张以蓄为主，多蓄少排，不仅用水库来蓄，而且在广大的地面上来蓄。这种蓄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又包含着排，不过不是排到长江或大海里，而是从田里排到大面积的河网中。所以是蓄中有排，排中有蓄，主要是蓄。这样的治水方法，是历史上没有过的。这个治水的理论问题，到现在才算

解决了。但是，如果依靠群众自办为主的思想没有解决，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调查研究，不总结群众的经验，不把治水与生产结合起来（这正是群众的迫切要求），以蓄为主的方针也就不会总结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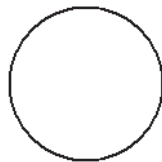
第三，大中小相结合是我们的水利建设方针之一，但是大、中、小型工程以何者为主，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不是根据主观随意决定，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毛泽东同志说：“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增减程度来决定的。”（“矛盾论”）可是这个道理，在实际工作中，也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在治理淮河的问题上，如果只满足于大型工程，而忽视中小型工程，显然不能解决问题。大型工程，如修大水库，它的防洪作用很大，但这些工程不仅花钱多，收效不快，而且不能全部解决平原上的水利问题，因为大雨不一定都落在修有水库的山系上。所以只治点不治面，显然是不对的。小型水利工程，不仅是群众性的工程，靠近村庄，兴修方便，群众的力量容易使用得上，而且可以解决大面积的问题。在开始大搞河网化的第一个冬天和春天，淮北的土方工程不断加翻，群众情绪空前高涨，就是由于群众对这个方针积极拥护。但到了一定时候，又不能完全满足于小型工



程。去冬今春，安徽的水利工程，因为要以解决易旱易涝和改种水稻地区的水利为重点，所以大中型工程增多。在全省六处大型水利工程中，有三处与治淮直接有关。这三处就是蚌埠大闸、临淮岗水库、史淖杭工程，它们都是淮河中游的大工程。蚌埠大闸的作用在于抬高淮河水位，可以灌溉七百多万亩田；临淮岗水库可控制王家坝在流量一万秒公方以内安全排水，可灌溉一千二百余万亩田；史淖杭工程是解决史河、淠河、杭埠河三大流域的灌溉、航运、发电等水利综合利用的大工程，可以灌溉一千二百一十八万亩田，增加通航里程七百七十里，可发电四万七千瓩，年发电量一亿三千万度，估计年产鱼可达五亿斤。另外，还兴建中型水利工程一百六十四处，其中有九条新河已全部动工。这些大型和中型工程对于解决淮北和其他地区大面积的灌溉和交通运输问题，都将起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今年安徽水利工程的特点。由于群众对水利工作已收到实惠，所以现在动员大批劳动力去兴修大中型水利工程，就比以前更容易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由此又可以看到，大、中、小型结合，到底应以何者为主，是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绝不是永远不变的。我们必须看到矛盾是发展的，必须重视矛盾的对立面的转化，研究矛盾双方在什么时候互易其位，而不要以一成不变的眼光去对待矛盾。同时还要指出，治淮上的小工程，从分散来看是小工程，从综合来

看，从效果来看，则是最大的工程，因为整个河网化工程，比任何其他水利工程都要大。如果我们孤立地看问题，就看不出淮北小型工程的重要性。有些同志开始时看不起小的，只想搞大的，也就是由于他们是孤立地去看问题。当然，人们的认识要正确反映客观实际，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但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缩短这个过程，才能少走或不走弯路。

安徽治水的胜利，是党中央治水路线的胜利。在治水中，由于运用了辩证观点来考察问题，解决问题，才在实践中取得胜利，而实践又充实了我们对辩证法的认识。但是我们还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现在淮北平原的河网化工程还没有最后完成，我们的经验还应该进一步加以总结。河网化的水利工程是万年大计。图纸和规划是可以修改的，但河网化完成以后就不好重新再挖一次了。所以河的大小，河网的密度和规格，河网形成后的管理工作和综合利用等等，都还要根据已有经验作进一步的研究。



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

· 邓 拓 ·

一 工农联盟的新情况

周恩来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人民大团结的基础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通过人民公社运动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跃进，这一联盟是愈来愈巩固了。现在也还有某些不属于工人农民的阶层。在继续加强工农联盟的前提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将继续保持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这一段话简洁地说明了：我国工农联盟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处在人民公社运动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大跃进的形势之下；这个联盟，作为人民大团结的基础，必须使自己继续加强和巩固起来，并且以此为前提，继续保持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

人民公社运动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跃进，对于我们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显然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它给我们带来了蓬蓬勃勃的全面发展的新气象。从工农关系上说，公社化和大跃进非

常有利于我们为逐步消灭城乡差别、逐步消灭工业和农业的差别创造条件；这也就非常有利于工农联盟本身的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们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写道：“从现在开始，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根据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逐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共产主义的因素必将逐步增长，这就将在物质条件方面和精神条件方面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这个任务，正如决议所说，“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复杂的任务。”如果我们不是紧紧地依靠工农联盟的力量，并且由此



进一步团结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那末，要想胜利地完成这样巨大而复杂的任务，将是不可能的。

现在，如何加强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亲密联盟，如何加强工业和农业的相互支援，越来越明显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了。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地建立了人民公社之后，在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比过去更加巩固了。广大的农民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工人阶级和城市工业给予更多更大的援助；同样，工人阶级和城市工业也需要从农民和农业方面得到更多更大的援助。

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们在参加了石景山人民公社总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成就的会议以后，议论说：“我们过去不了解农民兄弟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人曾经错误地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农民即便不拉后腿，也不会干出什么名堂来。哪里想到农民真的大踏步前进了！我们如果不努力增加生产，就要落到农民的后边了。”在最近开展红旗竞赛的时候，第一热风爐車間的工人们说：“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都需要拖拉机，可是我们的钢铁生产还不多，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们必须好好提高生产效率，发挥社会主义工业的优越性，给社会主义的农业以有力的支援。”实际上，石景山钢铁厂党委和工会组织，已经领导工人帮助公社做了许多事情，如帮助进行基本建设、建立社办工业、参加农业劳动等等。公社的农民们普遍地表示：

“我们要是不加紧生产，真对不起工人老大哥对我们的帮助。”这只是从大量事实中举出的一个例子。这个事实已经足以说明，现在的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相互之间都迫切地需要对方的支援。

从北京市的材料看来，现在城乡互助、工业和农业相互间的支援正在日益增强。比如，一九五八年北京郊区各个人民公社总共得到城市工业支援的主要生产资料，有下面这许多：

排灌机械	3,250 台(共39,334匹馬力)
新式农具	14,544 件
化学肥料	2,971 万斤
药械	7,565 架
农药	459 万斤

这些主要的生产资料的供应量，基本上满足了京郊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在生产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中供应给各个公社的近四万匹馬力的排灌机械，约能浇地八十万亩。这些排灌机械的每一匹馬力，一天能浇地二十亩左右，与一个畜力水車一天只能浇地四亩相比，效率提高了四倍，成本反而降低。这是对于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的实际援助。一九五八年京郊农业生产有了巨大的跃进，郊区各公社除了交给和卖给国家的粮食、棉花等以外，供应首都商品蔬菜十二亿多斤，猪二十七万头，还有其他许多东西。这些虽然不能完全满足首都迅速增长的需要，但是，比往年的供应量已经大为增加了。这里



仅就北京市历年上市蔬菜量，列举如下：

年 份	上市蔬菜量(单位万斤)
1954	38,526
1955	47,707
1956	59,204
1957	82,174
1958	126,177

事实证明，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发展城乡互助，使工业和农业互相支援，不断地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的决定性条件。

但是，农民本来是有两面性的。他们

曾经同时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几年来经过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他们已经不再是小私有者了。然而，由于他们摆脱个体经济的时间还不久，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原有的小私有者的意识还不容易很快就完全扫除干净。同时，由于现在的人民公社乃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的差别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存在。因此，农民和工人仍然不能不处在两种不同的阶级地位上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加强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无疑地是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保证。

二 努力增强工农联盟的基础

作为两个阶级力量的联合，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必须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今天我国工人和农民的共同利益是什么呢？这就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迅速地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逐步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水平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这个共同的利益，工人阶级和过去一样将坚持奋斗到底，因为工人阶级除此以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利益。至于农民眼前的特殊的利益，也完全可以同长远的

共同的利益结合起来。在过去人民民主革命时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我国广大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贡献了巨大的力量，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也使自己获得了土地和民主权利。这就是说，在过去革命的时期中，农民的利益是与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在一起的。过去能够这样，现在更能够这样。现在的农民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觉悟，他们逐渐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使农民永远免于贫困，才能使农民得到彻底的解放。

我们党和工人阶级过去领导农民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使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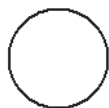
民分得了土地，并不是希望农民永远遭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而是按照我国的历史条件和农民觉悟的程度，首先用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去代替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然后逐渐创造条件，再从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一步一步地过渡到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的道路上来。事实证明，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这完全适合于我国农民觉悟水平逐步提高的过程，使我国社会主义的事业能够得到顺利的发展。

不能否认，农民是不会自发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恰恰相反，农民在过去长久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是小私有者阶级，而在小生产中是随时随地都在生长资本主义的。在人民公社运动开始以前，我们看到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展开了一场社会主义思想战胜资本主义思想的激烈的斗争。经过这一场斗争，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坚定下来；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倾向受到了严重的批判，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动摇情绪被克服了；少数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反动活动，遭受了有力的打击。这样就给现阶段的工农联盟奠定了更好的政治基础。今后为了继续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从各个方面进一步增强这个政治基础。

实际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农村中原来的贫农和下中农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是工人阶级在农村中最可靠的

基本力量。但是，他们当中也有少数人受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只有从思想上、政治上展开了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些贫农和下中农才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坚决地摆脱资本主义的影响，完全站到社会主义的旗帜下面来。至于富裕中农，经过批评和教育也是可以争取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的。过去那些动摇不定的富裕中农，逐渐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只能使少数人暴富而使多数人陷于贫困，那是走不通的一条死路；他们根据亲身的体会，相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劳动和劳动好的人决不会吃亏，因而他们终于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有一些曾经对社会主义有抵触情绪的富裕中农，经过了思想斗争又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基本上解决了思想问题，向左转了。另一种是过去有严重的剥削行为和从事投机的富裕中农，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如果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对自己是不利的，于是随着大势所趋，也投到社会主义的路上来了。无论他们的表现有什么不同，事实证明，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争取和团结他们的目的是完全可能的。

随着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的扩大和增强，我们还要更进一步地努力增强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为要增强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只有努力全面地发展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工业是主体；但是，绝不能因此而看不到社会主义农业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必须一手抓工



业，一手抓农业。而工业和农业是互相促进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情况表明，农业的跃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迫切需要改进技术条件，这就要求工业给予

农业以新的装备和其他技术的援助。农业的迅速发展是促进国家迅速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但是，要促使农业迅速地发展，又要依靠工业的大力支援。

三 运用国家力量为工农联盟的利益服务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保证工人阶级在工农联盟中的领导地位，促使工农业共同高涨，促使城乡关系的逐步融洽。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国家供应农业生产资料的数量不断地增长。例如，据北京市所属的朝阳、丰台、海淀、门头沟、昌平五个郊区的统计，一九五二年国家向这些郊区供应的农业生产资料的总值是九十九万元。以此为基数，那末，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八年，逐年增长，有如下表：

年 份	总值(单位万元)	增长率
1952	99	—
1953	412	4.16
1954	812	8.20
1955	868	8.77
1956	1,528	15.43
1957	988	9.98
1958	2,099	21.20

实际情形还不只是这样。由于国家的大力扶植和厂矿企业的积极援助，许多人民公社也兴办了各种小型的工业。一九五

八年北京郊区乡村出现了五万九千一百八十五个小型工业单位，后来经过各公社调整合并为八千一百七十八个单位，全年产值为三亿零七百五十一万元。许多乡村的小型工业在配合大工业和城市建设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使城乡关系更加密切。例如，为了配合首都建设和钢铁生产，去年京郊有四百五十五个砖窑、瓦窑、灰窑、砂石场等，生产和供应了五亿五千多万块砖、十三万多吨石灰、一百五十多万立方公尺的砂石。

由于国家每年发放各项贷款，努力发展农业、林业、牧畜业、渔业和其他各种副业，特别是加紧进行有关农业的基本建设，使农村面貌迅速改观。解放以来，北京郊区水利建设的发展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几年来京郊农田灌溉面积增加的数字如下：

年 份	灌溉面积(单位万亩)	增长率
1949	22.2	—
1952	37.3	1.68
1957	58.2	2.62
1958	237.2	10.68



在郊区农村中，許多地方已經沟渠縱橫，大片旱地变成了水田或者水浇地。去年能够灌溉的耕地面积为二百三十七万二千亩，已占京郊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广大农民越来越多地直接感受到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国家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是否采取正确的政策，这也是影响工农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五年間，农产品价格曾經逐年上升。一九五六年以后工业品和农产品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合理的比价。这是符合于我国工农业发展的要求的，因此，也十分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我們今后还要繼續通过价格政策，把工业的利益和农业的利益进一步結合起来。

工农业經濟的結合，實質上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的結合。对于目前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應該过早地加以改变。按照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所規定的方針，我們應該进行长时期的努力，使人民公社逐渐增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以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經濟，在将来能够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

从北京郊区各个人民公社的情况看来，充分地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对于工业和农业經濟的进一步結合，对于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有着十分重大

的作用。

郊区的人民公社由于認真执行了“統一领导、分級管理”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則，把生产责任制同按劳分配制度結合起来。这样做的結果，生产上已經出現了一片新气象，劳动生产效率大大地提高了。北京郊区各人民公社普遍地采用了“劳动定額管理制度”，作为計算社員个人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社員們的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一致地称赞这种劳动报酬的計算方法是公平合理的好方法。人民公社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增加了公共积累，扩大了集体福利事业，同时也保证了社員实际收入的增加。去年在北京郊区人民公社进行調查的結果，証明全郊区有百分之六十二点四的公社社員，已經达到或超过了当地原有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有百分之十的公社社員，刚刚接近于当地原有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有百分之二十七点六的公社社員，生活水平还低于当地原有富裕中农。再經過今年农业生产的繼續跃进，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将会进一步改善，公社的公共积累也将会增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将更突出地显示出来。

我們的国家是以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經濟的結合为經濟基础的；我們国家的各项政策必須为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而服务，也就是为工农联盟的利益而服务。



四 加强思想政治领导是巩固工农联盟的关键

在建設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的伟大目标之下，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担负着艰巨的任务。而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又是社会主义大工业的生产者。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工业必然要领导农业，城市必然要领导农村。工农联盟如果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就将不可思议。这个道理是人所共知的。

农民小资产阶级必须经过长期的教育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实践，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自觉的劳动者。所以加强工人阶级的思想政治领导是非常必要的。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政治积极性不可分开。要提高生产积极性固然要从经济政策方面采取各种措施，而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进行工作同样也很重要。

对农民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注意农民的特点和农业生产的规律，通过农民亲身的体验，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实际经验证明，组织农民参观工矿企业和工业展览会等，让农民直接访问工人，谈心交朋友，这是最简便易行而收效较大的方法。所有到大工厂参观过的农民，都异口同声地赞佩“工人老大哥真有本事”。他们回到社里干劲也大了。在农业劳动过程中，应按照需要组织协作。这对于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是有利的。去年秋季为了深翻土地，大规模组织劳动力的时候，许

多公社实行“大协作”，劳动效率显著提高。

由于郊区和城市的关系特别密切，城市的职工、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和驻军参加生产劳动，给予郊区农民群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工人阶级为公忘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风格，深深地影响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当然，这些人参加劳动自己也受到很大的教育。

发展农村中的文化教育事业，无疑地是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的经常的重要的方法。一九五八年北京郊区中小学学生在学人数，比一九五七年有显著的增加：小学学生从四十七万名增加到五十五万名；初中学生从六万三千名增加到九万名；高中学生从五千六百名增加到八千六百名。据丰台区农民子弟入学情况的典型调查，现在小学生在学人数为解放初期的二点三倍，中学生在学人数为解放初期的一八点五倍。今后随着农村文化教育的普及，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更将大量地涌现出来。

加强党的领导和党在农村的组织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党在农村的组织必须把人民公社领导得好。现在经过几个月的整社工作，干部党员的工作作风有了新的改进，党和农民群众的关系，更加亲密了。最近北京郊区农村各个人民公社先后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贯彻



执行了群众路线，并且使干部和广大群众又一次受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教育。

经过这许多方面的努力，我们一定能

够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更好地调动起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深耕（国画）

赵枫川



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 商品价值形式问题

胡 钧

编者按：有些读者建议讨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问题。胡钧同志在他寄来的“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问题”的文章中，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种看法，为了展开讨论，我们照作者的原文发表。我们欢迎大家参加有关这类问题的讨论。

在我国目前，由于还存在着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所以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与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和各个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通过商品的交换来交换彼此的劳动，经过这种联系方式把工业与农业组成统一的国民经济，保证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只要集体所有制存在，商品关系就必然存在。不恰当地削弱或改变这种联系方式的做法都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因而就一定会有害于生产的发展。

除此之外，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也有着商品关系的形式，无论在国营企业之间的产品运动方面，或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都广泛地利用着商品价值形式。这种形式，

卓有成效地被利用来检查和监督企业的生产状况，它能使企业管理者了解到本企业的经营水平和劳动消耗状况，从而促使企业最大限度地节约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国家也利用价值形式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此外，在消费品的分配领域内，价值形式也被利用来计量生产者个人在总劳动中参加的部分，从而也计量各个人在共同生产物中可以消费的部分。它是贯彻按劳分配的一个有效的工具。

我在这篇文章里就是试着分析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的本质，而主要是分析全民所有制内部消费品分配领域内这种形式的问题。



一 什么是商品关系

为了研究问题方便，先说明一下什么是商品和商品关系。

商品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而这种关系不能仅认为是分配关系或交换关系，它是一种生产关系，是人们之间的生产劳动的交换关系。但仅仅这样说还是极不够的。劳动交换在任何人类社会中都必然存在的，但绝对不能认为所有的劳动交换关系都是商品关系，只是通过物与物的交换来实现劳动交换的这种关系才是商品关系，否则就不能称作商品关系。马克思就曾指出：“在商品生产者社会内，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形成的：他们把他们的生产物，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并在这个物的形态上，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一的人类劳动，来发生相互关系。”（“资本论”第1卷，第62页）显然，作为一种劳动交换方式的商品关系与一切其他非商品关系的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生产者是在物的形态上，把自己的劳动当作等一的人类劳动来进行劳动的交换。而人们借以实现其劳动交换的物品就是商品。这也正是“商品一般”的质的规定性，也正是商品关系与其他方式的劳动交换本质区别所在。这种劳动交换方式是由于生产资料和产品属于不同所有者决定的，而其结果就是把劳动生产物分裂为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的等量表现在物的等价上。

通过物的形态进行劳动的交换，交换双方所关心的就必然只能是生产物之间的比例关系，等量的同种物品就被看作是相同的等量的劳动。不管实际劳动耗费怎样，等量等质的物品就只能在市场上换得同量的其他物品，这是商品关系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实际上，具有同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在同种的等量的物品内耗费的实际劳动往往是不同的。影响这一点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由生产资料的优劣所带给劳动者劳动效率的影响。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同等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的劳动者，会因技术装备的好坏而花费不同量的劳动，因而在每件产品上就实际上凝结着不同量的劳动。可是，在真正的商品关系下，即通过物的形态来交换劳动的条件下，交换双方在交换产品时都根本不考虑（因为都承认对方是其生产资料的单独全权主人）也不可能考虑（因为是在物的形态上交换）这一点。这正是商品关系，即通过物进行劳动交换的关系，与直接劳动交换关系的本质区别之一。

假如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劳动者在交换劳动时，抛开了生产资料优劣所带给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只是根据劳动者本身的劳动的质量和数量来等量交换，相同的劳动状况，工作同样的时间，就领取相同的收入，那么就可以肯定，这里的劳动交换



不会是在物的形态上进行的，而是一种直接的劳动交换关系；因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抛开生产资料质量的影响，而只核算劳动本身的质量和数量。例如，在农业社中实行工分制的情况下，劳动者的收入就只是根据劳动者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决定，那就正是反映了由于生产资料已属于同一个主人，他们的劳动交换已摆脱原来作为小生产者时那种物与物交换的形态，而在生产过程中直接进行劳动交换，从而也就不再是商品关系。

所以，我认为不能把任何的劳动交换关系都看作是商品关系，同样，也不是任何等量劳动的交换关系都是商品关系。只有劳动的交换是通过物与物的交换，从而劳动的等量表现在物的等价上，而交换双方的收入又是与这个交换的结果直接联系着，才是实质上的商品关系。只有体现着这种关系的物品，才是商品。

要确定一种关系是否商品关系以及讨论商品关系的消亡问题，是应当把握住这一点的。

二 国家与职工的关系和职工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

从现象上来看，消费品是通过买卖形式才进入职工消费中去的；职工从国家领得货币工资，然后到国营商店去购买适合自己需要的消费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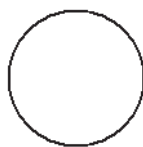
有些同志，没有对这里的内部关系作深入分析，只是从这个现象出发，就肯定说这是个人与国家的商品交换关系。现在就来分析一下，看看这里是否存在真正的商品交换关系。

假如说，职工向国家购买消费品是国家与个人间的商品交换关系，那就是说双方是等价交换。可是，假若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与国家供应给他的消费品所包含的价值真的是相等的話，那就是说，他取回了他贡献给社会的劳动的全部。但是，这样就成了拉萨尔式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人领回的

只能是在扣除为社会基金劳动的部分后的劳动部分。工人只是以这部分劳动，到社会上领取与这个劳动量相当的那么多消费品。可是这样一来，工人贡献给社会的与他所换回的就不能说是等价的。所以，这里根本谈不到是等价关系。

又有的同志说，他们所指的就是在扣除社会基金部分后，工人实际领回的劳动部分与他们所购买的消费品是等价交换，因而与国家是商品关系。可是这也很难说得通。在这里工人所领得的货币，并不是与他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直接相联系的。从经济关系上来说，它不是工人所创造的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在这个领域内，货币并不是作为一般等价物来衡量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下列事实可以说明：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同质同量的同种劳动，虽然由

6



于设备好坏的不同，会制造不同量的产品，从而创造不等量的社会价值，可是他们却得到同量的货币工资。在这里，同量的货币丝毫也说明不了工人创造的社会价值是多少和是否相等。这明显地表明：在这个关系中，货币并不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的证明，而只是劳动者贡献给社会的一定的劳动量的证明。由此可见，把职工用工资去购买消费品，说成是职工与国家的等价交换关系也是不恰当的。第一，假如这种等价交换，是指劳动与消费品的价值之间是等价的话，这不合理，因为劳动不具有价值，价值只是凝结的劳动；第二，假如说货币是体现着这部分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话，那么，这里同量的货币并不代表等量的价值，但它却能购买等量的消费品。因此，这也不是等价关系。

实际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交换关系，是指同一所有制内部（包括全民所有制内部和集体所有制内部）劳动者之间的劳动交换而言的。这里发给工人的货币，就是作为计量各个劳动者贡献给社会的劳动量的统一证明，每个劳动者贡献给社会等量劳动就值得等量的这种货币。因此，这里的货币显然不是表现个人与国家间的等量劳动交换关系，而是指劳动者之间等量劳动的交换关系。就是说，向社会贡献等量劳动，就会取得等量的消费品。马克思谈到按劳分配是等量劳动的交换关系时，实际是指劳动者之间的交换说的。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说到消

费品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着重点是引者所加）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着在商品等价物的交换里也通行的那个原则，即一种形态的一定数量的劳动可以与另一种形态的同量劳动交换”（《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21页）。

现在再来分析一下这里的等量劳动交换关系，是不是商品关系的问题。

很明显，在这里人们并不交换生产品。马克思在说明这种关系时就曾特别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因为这里“个人劳动已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全部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同上引文）。既然不交换彼此的产品，那么产品怎么就会变成商品了呢？

为了较深入地阐明这一问题，我们再试着详细分析一下国家与职工和职工之间关系的本质。

国营企业的每一件产品都是全体劳动者的财产，每个工人把自己的劳动贡献给全体，然后根据自己的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从代表整个劳动人民管理经济的国家取得收入。这种收入的多少，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即从消费基金的总额多少来说，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但就消费基金本身的分配来说，表面看来是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实际上它首先直接是国营企业全体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是劳动者彼此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每个劳动者以一定形态的劳动贡献给社会，同时换取另一形态的等量的他



人劳动。正由于他们都是这些产品的共同主人，他们的劳动又都直接是社会劳动，因此，他们的劳动就不是在市场上来证明是不是一般人类劳动；他们之间劳动的交换，也不会凭借商品的交换即通过物与物的交换来实现，而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直接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这里的劳动者，并不是以自己的什么“商品”与国家或其他劳动者交换，来换取自己需要的消费品，而是从国家取得一个自己在生产中劳动的质量和数量的证明，这个证明是国家根据他的劳动，预先确定分配给他的消费品数量的证明，职工就以这个证明，向社会领取适合自己需要的消费品。马克思所以把这种消费品数量说成是“预先确定”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劳动质量和数量，不是将在物的等价上即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被评价的，而是直接在生产过程中就被评价了的。例如两个同等的劳动力，虽然由于使用的生产条件相差悬殊，因而产量差别很大，但却直接在生产中被发给大致同量的报酬，因而就确定可以取得同量的消费品。这种情况清楚地证明，他们的劳动交换，不是通过其生产物的等价进行的。这里的消费品，无论以什么形式表明它包含的劳动量，它都不是这里人们劳动交换所借以实现物品。假如在物的等价中去评价他们的劳动，那他们就不可能取得等量的收入。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作为交换根据的“劳动量”，与商品交换中所根据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虽然也是

指一般人类劳动讲的，但它却仅指劳动者本身劳动的质量和数量，而抛开了由于生产条件的不同所带给劳动质量的影响。而后者却包含着生产资料好坏对劳动质量的影响。在按劳分配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劳动者，都不会由于利用了较别人更为先进的设备而产生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获得更多的收入。因为全体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都是完全平等的。而在商品交换的条件下，却不是这个样子。这显然是反映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关系。

由此可见，在按劳分配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与商品交换关系是根本不同的。至于劳动者在取得消费品时采取什么形式，运用怎样的经济杠杆，都不能混淆这两种不同的关系的本质。按劳分配的形式，可能是直接标明劳动时间的证书，也可以象目前实际上所采用的货币形式，也可以是其他什么形式。但无论如何，它本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而只能是个人从国家领取自己贡献给全社会的劳动质量和数量的证明，再凭这个证明而由社会储备中领取符合自己劳动的适合自己需要的消费品。也正因为按劳分配关系与商品交换关系有这种本质的区别，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在谈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时，为了避免混淆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关系，都谨慎地避开了商品生产以及与其相联系的一些范畴。很多同志在谈到马克思论述按劳分配时未涉及到商品货币这一点时，总说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



預见到社会主义的具体情况，这显然是一种极大的誤解。

为了深入說明这种表面上存在的“商品关系”的实质，我們还可以从其最简单的形态上去探索它。这就是暂时把货币抽去。我認为，为了能在更簡明的形态上探索生产关系的本质，这样做是可以的；因为货币在这里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交换的手段，有它或沒有它，对商品关系的本质絲毫沒有影响，物物直接交换同样是完全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在分析中抽去货币，絕不是忽視货币在目前經濟中的巨大作用，只是为了帮助我們看清人們之間关系的本质。

我們把货币抽去后，国家和职工的关系就表現得很明显了，这就是：每一个职工給社会贡献一定数量和質量的劳动，然后向代表整个社会的国家，領取按照他的劳动預先确定分配給他的消费品。从这里，我們能够看到絲毫商品关系的影子嗎？显然不能。这里根本沒有商品的交换。我們再假設，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設想的，在能够直接用劳动時間計算劳动耗費的条件下，发給每个劳动者一个劳动量的証書——劳动券，劳动者再拿它去領取适合自己需要的消费品。显然在这里，人們也不会認为是商品关系。那么，为什么由于人們还未能够立即直接用劳动時間來計算劳动耗費的条件下，利用货币形式來进行分配，就成为实质上的商品关系呢？难道利用什么形式这点，也会决定人們之間关系

的实质嗎？

真正商品关系存在的地方，参加商品交换的人們的收入，是由交换的結果决定的。劳动的質量只能由交换來評价。但是，国营企业中工人的收入水平却与商品交换本身沒有联系。这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 不論同一部門各企业之間，在生产同一种产品上耗費的劳动時間，是低于还是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時間，都不会由于这些产品的銷售是根据社会必要劳动进行，而使这些企业成員中同等劳动力（包括厂长等在內）的收入，有多少的差別。他們的收入只是根据他們的劳动技能、熟練程度和支出的劳动数量等决定，而根本脱离商品交换那种“等价原則”所引起的后果。企业产品的个别劳动耗費与規定的統一的出售价格的差額对生产者的收入沒有直接影响。有的同志提到奖金問題，好象这会表明人們的收入与商品交换的結果有联系。这是完全不对的。奖金只是对經營好的企业的物質鼓励，与其产品銷售的結果沒有必然联系。由于設備条件特差或其他原因而有很大计划亏损的企业，只要它做到有更少的亏损，这就应当受到奖励，虽然它在“商品交换”中仍然是亏损者。

(2) 假如由于某种原因，国家规定某种商品价格上升或下降了，它也絲毫不象真正的商品关系那样，表示着生产者間关系的变化，也就是說，这种价格变动，不会使这个企业的生产者的收入水平与其他企业发生什么新的差別。(3) 假如說职工收入



与商品价格有联系的话，那只是表现在职工货币收入与商品总价格水平之间的联系，因为总价格水平会影响着一定的货币收入所取得的实物量。但这个联系，只不过是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间的比例关系的反映。这只是表明国家预定分配给职工的消费品的数量上的变化。这种联系并不反映劳动者之间劳动交换关系的变化。例如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就用降低价格的办法来提高劳动者的消费量。这清楚地说明，这里的“购买”，实质上就是实现国家已确定分配给每个劳动者的消费品数量的形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全民所有制内部劳动者之间是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商品关系的。

为了进一步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拿全民所有制经济与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来比较一下。在这个交换关系中，即使把货币抽去，它不仅丝毫没有改变集体农民与国家之间原先存在着的商品关系，而且把关系表露得更清楚，这里仍然是通过物与物的交换来交换彼此的劳动。当然，这种商品交换与在私有制条件下是有本质区别的，这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它不再是在私有者之间进行的，不再是盲目、竞争和自发发展的，但它却是实实在在的商品交换。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生产和它与全民所有制经济进行商品交换的计划性，丝毫也没有改变通过物来交换劳动这种特点。劳动的等量

交换在这里仍是通过物的等价来进行。农民的收入就直接受到这种交换结果的影响（当然国家给予农民各种巨大的帮助，但其结果除了自给性的部分外，也是通过商品的交换表现出来）。农民所关心的，从根本上来说，是他们的产品与其所换得的产品之间交换的比例关系。在这个场合，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每一种产品价格的变动，都会直接影响到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收入，从而影响农民的收入水平。

那里是真正的商品关系，那里只是形式上的商品关系，这不是表现得很明显吗？

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同样一件产品，卖给国营企业的职工就只是实现按劳分配的形式，而卖给人民公社及其成员就体现着真正的商品关系，这不是诡辩吗？

不是的。当然，我们若想从百货公司的货架上来观察这种区别，这是荒谬的，正象要从一件物品本身确定它是商品，或不是商品一样地荒谬。商品本来就是通过物而建立的一种生产关系，我们不当以表面的观察为满足，而应当具体深入到这种关系本身来分析。其实，同样物品体现不同的关系，这种事情在任何社会内都是存在的。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同一枚货币，可以是货币资本，也可以是一般的货币。在小农经济中也存在同样情况：生产的同样小麦，自己食用的就不是商品，而拿到市场上出售的就是商品。在我们这里也是一样，仅仅被利用来作为计算劳动时间以分配消费品的价值形式与实质的商品



关系，也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抹杀这之间的区别也是不对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出，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分配的消费品，并不是体现着人们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因为这里人们根本不是通过它来交换彼此的劳动。这里是直接的劳动交换。假如不是把一切等量劳动交换都看作是商品关系的话，那么就不能把按劳分配这种等量劳动交换关系看作是商品关系。这二者是两种本质不同的经济关系，因而不能同时存在于一种关系之中。既然消费品这种商品形式已经不是原来的商品关系的体现者，因此，就这个意义来说，它只是具有商品的形式，

或称作商品的外壳。假如认清这一点，就通俗称作商品，也是可以的。那么这种形式的内容是什么呢？就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关系来说，它的内容就是劳动时间。这里所具有的价值形式，仅是作为一种劳动时间的相对的计算方式。这种形式就是以相对的方式标明它所包含的劳动量，从而可以正确贯彻消费品分配方面的按劳取酬原则。正因为它只不过是计算劳动量的一种方式，所以在同样是按劳分配的关系中，可以利用它，也可以利用别的方式。例如在农业社中和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内部，按劳分配就利用工分（劳动日）的形式来计算劳动量（这是劳动时间的另一种相对计算方式）。

三 全民所有制内部保留商品价值形式的原因 和这种形式的作用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人与人之间已不再存在原来那种商品关系了。这不是人为地消灭它的结果，而是生产资料转归同一主人后的一个自然结果。恩格斯说：“一旦社会领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以及与之一起的产品对于生产者的统治就将被消除。”（“反杜林论”，第298页）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时人们的劳动交换不会再借助其产品的交换来进行，而只能是在生产过程中直接的劳动交换。

生产资料转归同一主人和直接的劳动交换，就提供了直接用劳动时间计算劳动

量的经济上的可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正是从这种可能出发，考虑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借助于劳动券来实现的。

为什么目前在全民所有制内部，按劳分配仍然利用价值形式来贯彻呢？这主要是由于在现阶段，还存在着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并存，就决定了在国营工业和集体农业之间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国民经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既然在国民经济的相互依赖的两大部门中存在商品关系，那么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劳动耗费也就不可能直接用劳动时间



来計算，而必須借助于价值形式，使整个国民經济保持統一。也正因如此，在国营經济中，不論在生产領域內或消費品分配領域內，都利用价值形式。实践告訴我們，在目前阶段中，在生产日益高度社会化的条件下，价值形式是計算劳动量的一种唯一最好的形式。人民公社各生产队內部，随着生产的发展，随着集体所有制的扩大和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也必将逐步用价值形式代替其他的劳动量計算方式来进行核算和分配。在这里，正象我們前面所分析的，价值形式只是作为一种計算劳动量的工具被利用；它的存在絲毫不表明这里人們之間的关系，由于两种公有制形式之間关系的影响，而变成了商品关系。

在全民所有制內部，既然必須利用价值形式来計算劳动量，那么劳动時間的重大意义，也就表现为价值形式的重大意义和价值規律的重大作用。馬克思曾指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時間的作用。他指出：“劳动時間将会有二重作用。劳动時間之社会的計划的分配，使不同的劳动机能，与不同的需要，保持适当的比例。別方面，劳动時間同时又当作一种尺度，来計量生产者个人在总劳动中参加的部分，从而也計量各个人在共同生产物中可以消費的部分”（“資本論”，第1卷，第62頁）。这是馬克思假設已經可以直接用劳动時間計算的情况。但现实告訴我們，目前还不能做到这一点，而是仍然用价值形式来計算劳动量。因而上面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

時間的二重作用，也就必然表现为价值形式的作用。現在我們就是利用价值形式来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和生产資料，使之建立必要的比例；同时也利用它作为尺度，来計量劳动者贡献給社会的劳动量和应得消費品的数量。既然利用价值形式，而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从而个别企业劳动耗費与社会必要劳动耗費就能进行經常比較，使企业管理者了解到本企业的真实經營状况。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須在各种产品之間建立正确的比价关系，以确切反映产品的劳动耗費，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企业的真正經營状况和彻底貫徹按劳分配原則。这里表明，价值形式和价值規律显然有着极重大的意义。因此，說它只是一种計算劳动量的形式，絕不意味着輕視它在目前的作用。但是，不應該把这些对生产的良好作用，理解为是价值这种特殊計算劳动量的形式本身所特有的。实际上，就全民所有制內部來說，正象馬克思所說的，这是劳动時間的作用，而不是这种价值形式本身的作用。假如当建立了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并且又能直接用劳动時間計算劳动量，上面所說的那些良好作用同样是有的。但是在还做不到这一点时，价值形式就是最好的形式，价值規律的良好作用就应当充分地被运用起来。忽視价值規律的作用，就是忽視劳动時間的作用，这会給生产带来极有害的后果。

利用价值形式将是很长時間的事情。



劳动差别的多样性复杂性，使得直接用劳动时间计算，即使建立了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严格计算劳动时间，又是发展生产和产品分配所绝对必需的。因此，价值形式就是一种唯一较好的形式，也是一种已经普遍利用而为人們所熟悉的形式。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在目前考虑改变这种形式。在整个实行按劳分配的过程中，它会被利用着；到实行按需分配时，由于这时在主要消费品分配领域内，不再需要以劳动为标准了，这种当作计算劳动量的一种形式，当然也就在这个领域内不存在了。不过那时，它还会被利用在生产上。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指出这一点。例如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说：在私有制消灭后，“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5页）这个分

析，显然是完全符合客观发展的基本情况的。原子量的相对计算形式，既然这样长久地有效地服务于化学物理事业，为什么劳动时间的这种价值形式，就不能在需要严格计算劳动时间的场合，长久地有效地服务于生产的发展呢？只要我们认清，这里的价值形式——不论在消费品分配方面，或者在国营经济之间生产资料分配方面——只是被当作一种计算劳动量的形式运用着，它既不表明这里人们还存在原来那种商品关系，也不会阻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就完全没有必要考虑什么时候和怎样来消灭它的问题。价值形式什么时候不再被利用，也是一个自然过程。只要出现了这样的条件：两种公有制形式变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而且直接用劳动时间计算比这种形式更简便得多，这时，价值形式自然就成为多余的了。

四 对用按劳分配说明商品关系存在的意见的商榷

目前很多同志，力图从全民所有制内部生产关系某个方面寻找价值形式存在的根据，其原因就在于他们首先肯定了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着真正的商品关系。显然，这种“商品”关系，是不能用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属于不同的生产者这一个商品生产存在的一般条件来解释的，因而就出现了很多的说法。有些同志用按劳分配来说明，有些同志用消费品个人所有制来说明，等

等。既然大前提是不正确的，一切的论证和结论当然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不过，他们既然不是找到了别的，而是找到了这个理由，那就说明，除了其基本前提错了以外，还必然有着其他的理论错误。下面我仅论述一下按劳分配为什么不能决定商品关系的存在。

这种论点错误的理论根源，简单说来，就在于他们只表面地看到了按劳分配



与商品交换共同的地方，即它们都是一种形态的劳动与另一种形态的劳动的等量交换，但却没有看到二者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就在于：按劳分配所要求的等量劳动的交换是直接的劳动交换，而商品关系所反映的等量劳动交换是在物的形态上的劳动的相互交换，即等价交换。二者的本质的区别，正如上面所说的，就在于这个“等量劳动”中是否包含生产资料的优劣所带给劳动生产效率的影响。就这一点来说，它们反映着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关系。按劳分配所体现的等量劳动交换，是只有在公有制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而商品交换所体现的等量劳动交换，则只能是以交换双方互相承认对方是其生产资料的全权所有者为前提的。当然，商品交换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分配形式，但并不就是按劳分配。显然，谁也不能因为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是根据劳动进行，而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按劳分配的关系。

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质的商品关系也是同样情况，例如目前各个农村人民公社之间的情况就是如此。各个公社之间的土地肥沃程度不同，气候条件不同，每年所遭遇的其他自然条件也不同，这一切就使得各个公社花费等量的劳动而有不等的收获量。从而当他们拿到市场上交换的时候，相等的真实的劳动耗费，就不能换回等量的产品。由于公社还是集体所有制，这种情况就使不同公社的社员之间，在花费等量劳动的条件下会有不等的收入。从商品交

换的双方的关系来看，虽然是社会主义的，但却不是完全的按劳分配关系，可是它却一点也不违背商品交换的原则，而恰恰是根据商品交换的规律（等价交换）进行交换的必然结果。因为在物的形态上交换劳动，人们只能根据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由此可见，在存在实质商品交换关系的地方，是不能完全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就统一的社会范围内，即通过商品形式交换自己产品的双方的关系来看（不是就每个集体所有制经济内部来说），是与按劳分配原则不一致的。这一情况不是足以表明用按劳分配来说明商品关系的存在是错误的吗？他们虽然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按劳分配的产物，但真正的商品的等价交换却并不总是有利于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的。试图把一种关系说成既是商品关系又同时是按劳分配关系，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用按劳分配说明商品生产存在的论点，主要是用要求严格计算劳动量，来直接引出商品形式的必然性。这种说法的缺陷在于，他们没有令人信服地论证，按劳分配所要求的严格计算劳动在经济上为什么必然要求商品形式，而这种形式又为什么是其他形式所根本不可能代替的。我们可以问：为什么不直接用劳动时间，而必然要用商品价值形式这种迂回曲折的办法来计算呢？我们在具有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这种条件时，通过商品关系来联系是一种客观必然性，不是其他



形式所能代替的了，因为这不是个形式问题，而是一定的经济关系。但按劳分配这种关系在经济上却没有这种必然要求。

下列两方面可以证明：（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按劳分配和消费品的个人占有是通过劳动券来实现的；（2）实际生活中，例如在农业社中，它的实现也不是通过商品形式进行的。

假如要想论证它是实质的商品关系或有商品的内容，那就必须证明它是按劳分配这种经济关系的一种必然要求，但这就必须证明人们的收入水平是与商品交换的结果直接相联系的，象真正的商品关系那样。但实际上，职工的收入是在领得工资时决定的。当他们用货币工资去买消费品时，只不过是去实现预定分给他们的那一部分（指劳动量，而不是指品种）。这种交换形式本身并不决定参加交换的人的收入（这一点前面已分析过了）。既然如此，处在这种关系中的人们，为什么就必须要求利用买卖的形式呢？这有什么特殊利益可以是在利用劳动券或其他形式中所得不到的呢？显然没有。由此可见，这种商品形式就只不过是一种计算劳动时间的形式，

正象理论上和实际生活中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也可以利用它，也可以抛掉它而利用别的形式。当然可以论证，在目前条件下，商品形式是一种较好的形式；但为什么是较好的，就不能用按劳分配来直接说明，而是要探讨其他的原因了。

另外，若说为了严格计算劳动耗费，就必须有实质的商品交换，那这就不仅是按劳分配的要求，更重要的，它是生产本身的要求。生产本身永远要求严格计算劳动耗费。那么商品关系又怎样呢？

所以，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我个人觉得主要是他们只注意了经济现象表面上的联系，描述了这些现象，并用因果关系把它们联系起来，而忽视了从现象中探索经济关系的本质。这显然无助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理解。而做到这一点，却正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我们必须正确阐明全民所有制内部生产关系的本质，把这种本质揭示出来，使全体劳动者都清楚地认识到，从而更自觉地在这种关系中活动，以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上面只是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同志们指教。

